

# 前 言

文史资料工作在人民政协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是一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并惠及后代的光荣事业。早在一九五九年，周恩来同志就曾亲自提议开创了文史工作。他指出“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用历史知识教育启发后代”。并对文史资料的征集、研究、编辑、出版工作提出要“存真”、“求实”的原则，给文史资料工作指出了明确的方向。今天党中央号召学习祖国的近代、现代历史，对青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对文史工作有着多么深刻的亲切的现实的教益。

文史工作，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广泛地团结社会各界人士，撰写亲见、亲闻、亲身经历的史料，传之后代，使人民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以培植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更好地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临清市位于冀鲁之界，卫河东畔，是古代名城，源远流长。临清人民，既经受过长期封建王朝的残酷统治和剥削，又备尝国民党反动派、帝国主义的桎梏，尚有洪水旱涝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忍无可忍，向反动统治者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斗争，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辉战斗史诗。明朝万历二十七年，王朝佐在反税监马堂斗争中，仗义拯民而献身；清朝乾隆三十九年，王伦率义军与清军战于临清，终

不屈敌，烈焰自焚于汪家大宅；清朝同治二年，宋景诗率黑旗军与清军激战于汲河北岸烈王庙街。总之，历次反封建斗争都给统治者以沉重打击，为之敲起灭亡的丧钟。

在国民党反动派和旧帝国主义压迫、屠杀、剥削人民的时期，为了寻找革命道路，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至新中国诞生，无数革命者奔赴战斗前线，在战斗中立下战功。如领导宁都兵暴的刘振亚同志，抗击日寇壮烈牺牲于湖北宜城的张自忠将军，与叛徒李殊死斗争而牺牲在北平西郊的尉迟修职同志，有妇女界革命先烈黑若仙同志，有壮烈就义于青碗市口的李道先等烈士……为解放事业而战，为人民而牺牲的烈士有一千余名。他们的业绩都是教育后代的正面教材，亟待大书特书，永远载入史册。与此同时，还有赵仁泉、郑衍经、肖建九、冯二皮等，他们是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其罪恶史都是教育后代认识旧社会的反面教材，对这伙反动分子要给予深刻的揭露，无情的鞭挞，使青年一代更加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

在历史上，临清是全国闻名的手工业城市，在商业、交通、航运等方面都比较发达，素有“小天津”之称。境内且有舍利塔、鳌头矶、清真寺、龙山等名胜古迹，这一切都是宝贵的历史遗产。还有烧麦、枣脯、酱菜等众多名吃，也亟待书之而载入《临清文史》。

临清一九四五年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生了天翻地复的变化，工农业生产都有很大发展。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成为鲁西北的一个重要城市，更有大书特书的必要。

为了做好临清文史资料工作，政协临清市委员会向参加近代或现代革命斗争的老同志和全体政协委员发出呼吁：珍

惜历史，莫失良机，立即行动，抢救文史，我们决不能辜负全市人民的重托和希望。为对我们的子孙后代负责，老同志们在有生之年，要本着“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的精神，应当立即行动起来，积极投入文史资料的抢救工作，把我们的精神财富全部留给后代，把我们的余热，全部献给壮丽的社会主义事业。市政协的负责同志为我《临清文史》题写了几句话，愿与同志们共勉：

抢救文史，当务之急；今日教材，后世嫁衣；  
争分夺秒，莫误时机；广征博采，深挖细理；  
辩证唯物，科学分析；忠于史实，忠于真理。

政协临清市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五月

# 目 录

- 临清市历代行政区划沿革……………潘耀曾（1）
- 回忆张自忠将军……………栾升堂（8）
- 怀念战友尉迟修职同志……………张如三（25）
- 忆若仙姐……………黑伯理（33）
- 一九三八年的片断回忆……………韩多峯（38）
- 卡尔逊临清之行……………刘凤梧（52）
- 反税监斗争与王朝佐……………祁长安（57）
- 吴秋辉先生评传……………刘又辛（60）
- 临清十六景考述……………王洪辰（71）
- 临清清真寺……………潘耀曾（83）
- 临清砖窑史话……………张 伟（87）
- 回忆我在教会学校的生活……………李启才（93）

# 临清市历代行政区划沿革

潘 耀 曾

临清市位于山东省西北部，卫运河东畔，交通便利，物产丰富，其城区为历史上的名城。由于市场繁荣，曾有“小天津”之誉称，现为鲁西北工商业较为发达的重要城市。

临清的命名，始于后赵，与流经境内的主要河流——卫河有关。卫河由西南边境流入，在市城区南郊与运河汇合，沿市西北边境北上流出，合称卫运河，是境内主要河流。据《临清县志·疆域志》（民国二十三年版）上记载：“卫河古名清河，《战国策》云，苏秦说齐曰，‘西有清河’；说赵曰，‘东有清河’。”可证对清河古有记载。《汉书·地理志》云：“清河水出内黄县南，东北至信成，入张甲河。”历史上的清河郡、清河国、清河县、清阳县、清渊县，均由清河而得名。临清即因临依清河畔而得名。

临清市历史沿革考查旧志有所记述。临清市境在夏朝时为“兖州之域”，按兖州为古九州之一。《尚书·禹贡》上有“沛、河惟兖州”的记载。颜师古注：“沛，本济水之字”，言兖州东南据济水，西北距河（黄河）。临清市境是在兖州疆域之内。

到了商末，临清市境为“紂畿内地”。据《汉书·地理志》

上记载：“殷因于夏，亡所变更，商末纣盈钜桥之粟，聚乐戏於沙邱。”临清那时在沙邱境域之内。沙邱，古地名，在今河北省广宗西北大平台，殷纣于此筑台，蓄养禽兽，公元前二百一十年，秦始皇巡视途中患病，死在沙邱平台。在临清卫河东岸，大寺街西端，原有“避雨亭”，那里是一古津渡，清朝乾隆年间，王毅题其处为“沙邱古渡”，今因疏浚卫运河，旧址无存。此可证临清古时属沙邱地。

周武王伐纣灭商，设“三监地”。以殷都以东为卫地，封给管叔。临清此时属于三监地之中的卫地。

战国时期，诸侯兼并，七国争雄，临清曾属齐国、晋国、卫国，赵烈侯于公元前386年迁都邯郸，临清成为赵国的属地。

秦始皇二十六年庚辰（公元前221年），灭六国统一中国，废封建，立郡县，分天下为三十六郡，设钜鹿郡，临清属于钜鹿郡。

汉高祖元年乙未（公元前206年），临清隶属于清河郡。到了汉武帝元封五年乙亥（公元前106年），“开地斥境，乃分十三部，置刺史”，临清隶属于冀州刺史部、清河郡。此时临清境内有厝县、贝丘县、清渊县。

厝县：位于今市区东十五里处。东汉安帝（刘祐）时，移治城北，更县名为“甘陵”。葬其嫡母孝德皇元妃耿氏于县境内，尊为甘陵大贵人，在今河北省临西县简庄有汉耿贵人墓。

贝丘：在今市区东南十五里近古村西，尚有古城遗迹。系后汉时建置，隶属于清河国。据《太平寰宇记》云：“贝丘故城在临清县东南十五里，城中有贝丘，高五丈，周五十步。”

有后汉贝丘长博陵刘伯言、北海苑孟興（亦有作“兴”，待考）二碑。”今已无存。

清渊：西汉时置，隶属于冀州部、魏郡。在今市区西南四十里，馆陶县西北。北魏移治河东之清水堡，唐时省入冠氏。

三国时期，魏文帝黄初元年庚子（公元220年），设置冀州部、清河郡，临清属于清河郡。

西晋武帝泰始元年乙酉（公元265年），设置冀州部、清河国。临清隶属于清河国。

东晋成帝咸和五年庚寅（公元330年），即后赵石勒建平元年。石勒设冀州部、建兴郡，并设置了临清县。“临清”之名始于此，后废。

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一年丁丑（公元497年），复置临清县，隶属于司州部、阳平郡。据《临清县志》记载：“又别置临清县于水西”，“在今县治西三十五里仓集镇”，即今河北省临西县仓上村东，尚有旧城遗址。此处原有一寺，名“月洼寺”，其寺遗址犹在，此寺就座落在北魏时临清故城之内，北齐时废。

隋文帝开皇六年丙午（公元586年），又复置临清县，隶属于冀州部、清河郡。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从临清境内西部析置沙丘县，故后人称临清为沙丘，到了炀帝大业二年丙寅（公元606年），沙丘省入临清县。

唐高祖武德四年辛巳（公元621年），由临清县内复置沙丘县，至太宗贞观元年丁亥（公元627年），沙丘县又省入临清县。二县均隶属于毛州。

唐代宗大历七年壬子（公元772年），析临清另置永

济县，曾与临清先后隶属于瀛州、贝州的清河郡。

五代时期（公元907年至960年），临清县在梁、汉、周统治时，均隶属大名府；唐时则隶属于兴唐府澶州，晋时则隶属于广晋府。

宋太祖建隆元年庚申（公元960年），临清县隶属于河北东路、恩州。

南宋高宗建炎元年丁未（公元1127年），即女真族太宗天会五年，女真族统治中国北方，其间患水，移县治所于曹仁镇，在今市区以南十里旧县村。当时隶属于大名府路、恩州。

元世祖至元五年戊辰（公元1268年），临清县隶属于中书省、濮州。至元二十六年己丑（公元1289年），“罢胶、莱海运，开运河”，“由瓜州渡淮入黄，经临清北达天津，运漕粮北上”。其中自安山，经东昌至临清一段，因有元翰林学士杨文郁等乞赐名“会通”，故命为“会通河”。

明太祖洪武元年戊申（公元1368年），临清县隶属于山东布政使司、东昌府。洪武二年，县治由曹仁镇迁至中洲纸马巷，今福德街南端阁楼门楣上有“县治遗址”石刻。至代宗景泰元年庚午（公元1450年），七月二十七日动工兴建砖城，“而告成于十月十五日”（见《临清县志·艺文志》中《临清建城记》），县署迁至砖城内。

明孝宗弘治二年己酉（公元1489年），置临清州，仍隶属于东昌府，州下辖馆陶、邱县。

明世宗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公元1542年），在砖城外建土城，《临清县志·建置志》记载：“巡抚曾铣得、邱文庄公书曰，‘临清宜跨河为城’，于是自城之乾方，至巽方，



缘边墙拓而广之，延袤二十里，跨汶、卫二水建新城，俗名“玉带城”。

明朝仍沿用“元时四乡之名：曰会通、曰敬礼、曰彰信、曰明德。”

清世祖顺治元年甲申（公元1644年），临清县隶属于山东省、东昌府。

高宗乾隆四十一年丙申（公元1776年），升临清为直隶州，领夏（津）、武（城）、邱（县）三县。

中华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临清县隶属于山东省济西道。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改属于东临道。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改属于德临道。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废道制，临清县直属于山东省。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省下设专员公署，第四专署驻临清。临清县辖十个区：第一区为城区，辖45个镇；二至十区下辖517个村庄。

抗日战争时期，我市广大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展开游击战。为了适应对日作战，行政区划随着根据地的建立、巩固、扩大而不断变更。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大举侵犯我华北地区，由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敌人得以军事上的推进，于一九三七年十月间日军侵占了临清县城。共产党员颜竹林、王笑一等同志，遵照上级党组织指示，在临清北部十八村一带，领导群众建立人民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一九三八年六月成立了临清县战委会，同年十一月间，我党鲁西北特委组织八路军一二九师驻临联络处，同战委会一齐进驻了临清县城西南关，扩大了我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在敌人侵占县城时，我党政机关则转移到乡下进行活动。一九三九年春，为便于领导抗日游

击战争，在卫河以东地区成立了中共临馆堂工作委员会，临清卫河以东地区，即一、二、三、四区在其管辖之内。在临清县卫河以西地区，成立了中共临西工作委员会，管辖临清县的五、六、七、八、九区，建立了卫河支队，开展游击战。

一九三九年二月三日，日本侵略军第三次侵占了县城，我党政机关则到河西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九年秋，中共临西工委改为中共临清县委员会，与此同时，在修子搦村成立了临清县抗日联合政府，隶属于鲁西北行政委员会。其管辖地区仍为临清县河西的五个区。一九四〇年四月，临清县改属于冀南四专署领导。因处于游击战争时期，临清县党政机关驻址不定，多在摇鞍镇、孙楼一带抗日根据地。

一九四一年，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临清县对所辖区作了新的调整，将原五个行政区改建为八个行政区。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冀南四军分区司令员杨宏明、政治部主任孙毅民，在反日伪“铁壁合围”战斗中英勇牺牲。为了纪念他们的革命业绩，在一九四二年十月成立了宏毅县抗日政府。县下辖六个区、202个村庄（其中有原属于临清县的五、六、八区，102个村庄）。临清县在原有七、九、十、十一、十二，五个区的基础上，又增添了一个新八区，其范围在今河北省馆陶县西北部魏僧寨、果子园一带。

一九四三年九月间，在今路庄乡杨坟村，宣布成立卫东县抗日政府，临清县的二、三区归卫东县管辖。

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九四五年九月一日临清解放了。实行县市分治，改属于冀南一专署。同年十二月宏毅县、卫东县相继撤销，所属村庄仍归旧治。一九四九年六月冀南一专署撤销，临清县、临清市改属于河北省邯郸专署。

临清市辖市区范围，临清县辖县郊区四乡。一九五〇年临清市改为临清镇。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临清县、镇改属于山东省德州专署。一九五三年改属于聊城专署。一九五四年七月临清镇改为临清市。一九五六年三月临清县的沙窝屯、旧县两个乡归临清市管辖。一九五六年一月清平县撤销，将其二区（金郝庄）、三区（王集）、四区（康盛庄）五区（戴湾），划归临清县管辖。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临清县、市合并改称临清市。临清市辖城区三个街道办事处，郊区共有十五个人民公社。一九六三年三月撤临清市改称临清县。一九六五年三月将临清县卫运河西的尖冢、童村、下堡寺、吕寨、老官寨五个区划归河北省邢台专区，建临西县。同时将馆陶县的潘庄、八岔路两个区划归临清县。一九七一年一月撤区并社，下辖城关镇人民公社和十九个农村人民公社。一九八一年改城关镇人民公社为县辖临清镇人民政府。一九八三年十月撤销临清县制恢复临清市。一九八四年八月政社分开，建立了乡（镇）人民政府。全市建十四个乡、五个镇：杨桥乡、朱庄乡、唐园乡、烟店乡、路庄乡、尚店乡、大辛庄乡、戴湾乡、魏湾乡、康盛庄乡、肖寨乡、金郝庄乡、石槽乡、老赵庄乡；潘庄镇、刘垓子镇、康庄镇、松林镇、胡里庄镇。市城区设先锋路、新华路、青年路三个街道办事处。先锋路办事处又辖大桥村；新华路办事处又辖新开、南门、东关、林园、古楼、北三里六个村；青年路办事处又下辖窑口、车营、南关、教场、夹道、南厂六个村。原新华路办事处的顺河街、古楼南街划归青年路办事处；原石槽公社的五里庄、胡八里庄、徐庄、牟庄、李庄、马湾村划归杨桥乡管辖。

# 回忆张自忠将军

梁升堂

张自忠将军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是民族英雄，是在抗日战场上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他的以身殉国，激发了我国人民同仇敌忾的斗志。革命圣地延安，曾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大会于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五日下午五时，在中央大礼堂举行。会场上有毛泽东主席送的“尽忠报国”挽词、朱德总司令送的“取义成仁”挽词、周恩来副主席送的“为国捐躯”挽词，还有各机关、团体、学校送的很多挽词。朱德总司令和王若飞参谋长参加了追悼大会，同一千多名各界代表向张自忠将军遗像致哀，会上宣读了祭文，祭文说：“将军之伟绩，一战淝水，再战临沂，三战徐州，四战随、枣，鞠躬尽瘁，以身殉国，全国人民同声悲悼！将军之英勇奋战，足以斥责那班贪生怕死之徒；将军之为国牺牲，足以打击那班投降妥协之辈。一抔之奠，岂止泪洒同情；万众之心，实欲驱逐暴日。”他的抗日业绩，是使人永志不忘的。

## 投笔从戎追随冯玉祥时的戎马生活

张自忠，字荃忱，山东省临清县唐园村人，一八九〇年生。他性格坚强，豁达豪爽，正直诚实，勤奋好学，中学毕业后考入天津政法学堂。他青少年时期，正处于前清末年，外患频仍，国家多事，激起了他救国雪耻、奋发图强的决心。辛亥革命后，国家仍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一九一三年春节

前，在临清县城街市上，他亲眼看到警备队的兵竟任意辱打平民百姓，他非常气愤地说：“当兵的就这样目无法纪吗？”一九一四年春毅然投笔从戎，到在新民屯驻扎的第二十镇（师）车震部当学兵。一九一六经车震介绍到冯玉祥那里任差遣，后当排长、连长。由于他忠诚干练，得到冯玉祥的赏识和信任。一九二二年晋升为学兵团营长。他带兵和训练士兵，不仅非常严格，而且常以“誓雪国耻”为主要思想教育内容。有一次上级要调他到手枪营任营长，离开学兵团时，全体士兵痛哭流涕，依依不舍，不久冯又把他调回。每年“五·七”国耻纪念日，他总是大张旗鼓地作“誓雪国耻”的宣传教育，当时曾有几位朝鲜青年在学兵团入伍留学，他们对他们异常关怀，鼓励他们练好本领，准备去光复他们的祖国，作出应有的贡献。并常以朝鲜被日本吞并的惨痛事例，向士兵们进行教育。同时在教练方面，经常以日本侵略军为假想敌，以激励士兵们雪耻救国的决心。一九二四年冯玉祥反击曹錕、吴佩孚时，张自忠任学兵团团长，属新编第一混合旅，奉命增援固城一带。出发前，张向士兵们说：“咱们是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国民军，要齐心协力，把祸国殃民的坏习气除掉！”士兵们在他的激励和机敏的指挥下，一举战斗成功，迫使曹部固守固城的曹士杰旅投降。有力地策应杨村方面的作战部队，取得了胜利。冯玉祥推倒曹、吴后，张作霖东北军蜂拥进关，直奉联合，逼使冯玉祥退往察、绥地区，固守南口。为了保存实力，冯玉祥宣布下野去苏联，将国民军统率大权交给张之江。阎锡山陈兵晋北，窥伺国民军。一九二六年秋，双方在晋北发生战斗。当时张自忠任国民第一军第十五旅旅长，属讨阎西路军副司令石友三指挥。

石友三令张自忠向大同以南地区猛攻，张自忠率部连下口泉镇、怀仁、山阴、直趋雁门关下，晋军望风披靡，回雁门凭险固守。正值与晋军激战时，传来多伦失守、南口告急的消息，国民军沿京包线西撤，此时韩复榘、石友三别有用心，一面令张自忠限期攻下雁门关，否则以军法从事；一面又密令手枪连去逮捕张自忠，以吞并其部。手枪连连长是张自忠的学生，暗派心腹先行报告张自忠。张自忠深知石友三阴险毒辣，为了免被陷害，只身投到商震那里避难。商系冯的老朋友，热情地接待了他。石友三即勾结韩复榘拉着部队，向阎锡山投降了。

冯玉祥在苏联得知南口失守，全线退却，立即兼程回到五原，重整旗鼓，组成国民军联军，就任联军总司令，统领大军，经宁夏、甘肃，直趋陕西，击败刘镇华的镇嵩军，解国民第三军杨虎城在西安之危，冯进驻西安。冯了解到张自忠被迫出走的经过，与商震联系，要回张自忠。张自忠到西安，向冯陈述苦衷，冯慰勉有加，要他安心工作，任命他为总司令部副官长。一九二七年国民军东出潼关，参加北伐，会师郑州。冯在洛阳成立军官学校，派张自忠任校长。一九二八年军官学校进驻开封，张自忠积极训练学生，亲自教导，在大雪纷飞的严冬，和学生一样，踏冰卧雪，赤着脚从事战斗演习，有许多学生后来成了他的得力干部。是年夏任二十五师师长兼开封警备司令。一九二九年冯讨伐蒋介石，大军作战略撤退，调张自忠二十五师驻潼关，兼任潼关警备司令。是年又调任第十一军冯治安的副军长。

一九三〇年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展开了中原的军阀大混战。张自忠的第六师负机动任务，首先在许昌以西的

灵井寨一带，把徐源泉所部芮勤学的一个团击溃。接着在杞县附近，协同孙连仲部打跨蒋介石近卫第二师张治中部，俘获甚多。激战正酣时，阎锡山在济南方面溃败，影响全局。当时冯玉祥部由前方退集黄河以北新乡、焦作一带，尚有五万余众。但军心涣散，孙连仲又接受了蒋介石的改编。冯玉祥在难以挽回的战局下，只得撒手跑到山西晋城。这时只有张自忠的一个师还比较完整。冯又赴太原，命张自忠率部队到晋南，与从风陵渡入晋的宋哲元部到达运城，张自忠驻曲沃、鲍刚，张人杰驻翼城，与宋哲元取得联系。以上就是西北军失败后仅存的一部兵力。这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授权张学良负责整编，合编为第二十九军。成立两个师，宋哲元任军长，冯治安任第三十七师师长，张自忠任第三十八师师长。

## 从喜峰口抗日到接受与日寇周旋任务

第二十九军是在日军侵占东北，继续向关内窥伺，把蒋介石派驻北平的何应钦及其嫡系势力逐离平津以后，才进驻华北的。由于蒋介石一贯媚外，不抵抗，以及日本贪婪无厌的进攻，第二十九军处境极为险恶，全军将领鉴于“九·一八”惨痛教训，对日军一直有所警惕。一九三三年张自忠部在长城喜峰口抗击日寇，就是一例。张自忠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寇第八师团，毫不畏惧，以卓越的胆识，机敏的指挥，打得日本侵略军遗尸遍野，我军斩获无算。厥后在宋哲元主持冀察政务期间，张自忠先后任察哈尔主席、天津市市长，他对那班无耻媚外的汉奸极为痛恨。宋哲元最初曾派公开以“真小人”自命的肖振瀛为天津市市长。一九三六年肖与汉奸陈中孚、潘玉桂等勾结，接受日军驻屯军参谋长何知鹰二的要挟，履行

《何梅协定》，首先在天津市政府和市属机关内安插日本顾问。张自忠闻悉，立即要肖到北平面谈。那天在张自忠家里，有冯治安、张允荣、阮玄武等人在座。张自忠见肖进来，劈头就问：“你要在天津市府机关里聘请日本顾问吗？这是汉奸卖国的勾当！”肖说：“《何梅协定》定下来的，我是在执行啊，怎么说是汉奸卖国呢？”张厉声说：“你这样执行，就是卖国，就是对二十九军的莫大侮辱。二十九军的官兵就要一口一口地把你咬碎！你滚出去！”肖悻悻地溜走了。不久，宋哲元就撤掉肖振瀛的市长，由张自忠接任。

宋哲元当时为了在军事方面有个可靠助手，故特聘曾任西北军总参谋长的石敬亭为总参议，代他主持北平绥靖公署的事务。一九三六年间，有个辽宁人，勾结日本浪人在北平前门外的大旅社里开了一个鸦片烟馆和大赌场。当时的北平市长秦德纯，明知此事，却听之任之，不予过问。石敬亭知道后，极为气愤，派了一连手枪队在一个夜晚把旅社团团围住，将一帮人犯都抓了起来，当夜交军法处审讯，把主犯立即处决。这本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却把秦德纯吓坏了，竟在宋哲元那里说石敬亭独断专擅，事前也没有和谁商量，就这样蛮干起来等等。宋哲元听后未置可否。石敬亭获悉秦德纯在宋哲元那里说了他的坏话，感到小人当道，实难呆下去，遂愤然拂袖而去。行前给秦德纯留一信，要张自忠转交，信上写道：“绍文吾弟：遍观一部《宋史》，未见秦桧说过岳飞一句坏话，而飞竟死于秦桧之手，桧真乃大奸而特奸也。吾弟有乃祖之风，真不愧为秦氏之子孙，前途远大，好自为之！余去，留言致意。”张自忠看罢认为骂得痛快。过了几天，张自忠为此事在丰泽园请了许多人会餐，餐后到张自忠



家里。当秦德纯进来时，谁也没理他，张对人们说：“你们看，孬种来了。”接着又气冲冲地说：“我们这里又出了个孬种！”秦问：“谁是孬种？”张说：“你就是孬种！”秦说：“你喝醉了吧！”张说：“我没醉。孬种就是你，你为什么怕日本鬼子，比怕你爹还厉害！你为什么在宋先生面前说石敬亭的坏话，把他逼走？他给你的那封信你不是看到了吗？”这一顿痛骂，把秦德纯搞得狼狈不堪。

“七·七”事变前夕，陆军独立第三十九旅驻在北平北郊和通县，归张自忠指挥，事变是日军预谋已久，一手制造的。当时芦沟桥驻防部队是三十七师何基沣旅的吉星文团。当受到日军袭击时，何基沣毫不犹豫地严令吉星文团奋起抗击，揭开了战幕。坚持不抵抗主义的蒋介石却令宋哲元就地解决，与日军谈判，不要扩大事态，同时又派熊斌到北平，向宋哲元传达他的旨意，“要循外交途径解决”。宋哲元鉴于“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替蒋介石背黑锅的教训，要蒋介石拿出书面的正式指示，再行考虑，否则不敢从命，与此同时，日军向宋哲元提出，要冯治安的第三十七师全部立即撤离北平，并严办在芦沟桥“肇事”的我方官员，宋断然予以拒绝。一面继续与日方谈判，一面积极备战。这期间日军源源不断地开进关内。于七月二十八日拂晓，向我军突然袭击，副军长佟麟阁和一二二师师长赵登禹阵亡，南苑失守。宋哲元接到日军紧急通牒，要宋和第三十七师一起全部撤离北平，还可以继续和平谈判，否则将采取断然措施。宋哲元立即向南京政府提出要率二十九军固守北平，与日军作殊死战斗等等。蒋介石复电指示：“一、与日方继续和平谈判；二、北平四面受敌，着可留一员负责人与日方暂时周旋；

三、命宋哲元离开北平，前往保定，准备作战。”宋哲元召开军政首脑会议，决定他去保定，选定张自忠留在北平与日周旋，张自忠毅然站起来说：“现在战与和都成了问题，看情况事情一下子不会得到解决，为了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为了我们二十九军能及时脱离被敌人包围的危险境遇，为了长官的安全离开北平，目前这个任务我愿来承担，至于个人毁誉，在所不计！”宋赞佩张自忠的果敢，立即写了手谕，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主任兼北平市长和第二十九军军长等职。张接过手谕激愤地流下泪说：“委员长和大家都走了，我的责任太大，一定尽力而为！”宋也感动得热泪盈眶。当日傍晚，宋哲元、冯治安等匆匆离开北平去保定。

### 脱身虎口担起抗敌重任

张自忠召开了紧急会议，命石友三所部两个保安旅随三十七师行动，命三十九旅旅长阮玄武集合部队，恢复常态，安置好，以避免敌人在和谈中作为借口进行刁难。北平市内由市保安队、武装警察维持秩序。散会后张自忠将阮玄武留下谈话，张沉痛地说：“宋先生把我留下来，不是为了打，而是要我以和谈达到掩护我们部队撤退，免遭敌人包围。现在大家都走了，就剩下我们俩来支撑这种险恶的局面，敌人野心很大，平津的情况又很复杂，怎样才能渡过这个难关，我们要好好商量！你多思考思考，把这个局面维持一下。”阮说：“事情现已到了这种地步，我遵照你的命令办就是了。”七月二十九日阮玄武欲拉走三十九旅，未果。三十日中午张自忠、阮玄武商谈敌人的百般刁难，汉奸潘玉桂、陈

觉生的要挟。这时宋哲元从保定给张来电话，传达蒋介石的命令：只要继续谈判，所有条件都可接受，一切责任由中央政府负担。此时张和阮的行动，已逐渐被日方注意，一些大汉奸们竟然宣称，要张自忠通电独立。时值紧急关头，张与阮商量对策。张说：“事态发展得越来越坏，你一贯是反蒋的，又不是二十九军的嫡系，敌人的要挟，我绝对不能接受，你是否帮我缓冲一下，把当前的难关渡过。”阮说：“我俩情同手足，凡是我能做到的，坚决照办，可是绝对不当汉奸！”张听阮这么一说，就气愤地说：“你看我身上哪一块有汉奸气味？”又过了几天，驻在北苑的第三十九旅在日军压迫下被解除了武装。消息传来，张自忠很气愤地对阮说：“我在这一段时间里，已经竭尽全力而为，时机也差不多了，我们要赶快设法脱离这个险境！”两人分手后，张自忠很快就进了法国兵营躲避起来。不久，在英商怡和洋行当买办的赵子青，替他准备好一辆插着意大利国旗的小汽车，掩护他冲出北平，经通县到达天津。他到天津后没有回家，秘密地住在英租界内。赵子青又为他安排了一艘英商的小轮船，乘船驶出大沽口，直驶烟台。因受韩复榘刁难、拒绝，未能登陆。转驶青岛，秘密登陆，立即乘火车到泊头镇去见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将军，张自忠向冯玉祥详述经过，冯对他慰勉不已，亲笔写了封信，要张自忠持信去南京面见蒋介石，信上大意谓：当前强敌压境，正需要他这样将领，卫国杀敌，恳请速令张自忠回到前方，统率旧部，以安军心。当时，参谋长石敬亭向冯要求说：“我愿陪同张自忠去南京，面陈一切。”冯赞同，于是张、石二人乘车南下，到达浦口时，蒋已派人等候，乘汽车去见蒋，张自忠陈述奉命留守北

平的苦衷。蒋假惺惺地安慰说：“北平一切责任由中央政府承担。”石敬亭向蒋建议：“五十九军的官兵是张自忠亲自训练的，现在是用兵打仗的时期，请准张自忠复职，发挥他指挥用兵的才能，来报效国家民族，我石敬亭愿以身家性命来担保张自忠。”蒋答应道：“张军长在关键时刻勇于负责的精神，我十分赞同。”当即命令张自忠回前方，任五十九军军长，并电告宋哲元及五十九军副军长李文田和全军将士。张自忠即赴前线。

## 泚水克敌 临沂大捷 保卫徐州 转战豫鄂

张自忠到军中后，官兵振奋，士气高昂，这与他平时对待士兵亲如家人有关。他对全军营长以上官佐表示：“我们只有以必死的决心去战胜敌人，才对得起国家和自己的良心。”这时他的学生、老部下、第三十军的几位师长池凤城、黄樵松、乜子彬等联名祝贺他重任军长，他在回电中说：“国人对我不谅解，我无法辩解，我只有用我的血来洗涤以前的耻辱，我只有用我的死，来报答国家民族。”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知道张自忠勇略过人，曾在喜峰口歼灭敌第八师团，极为赞赏，请求中央把五十九军划归第五战区指挥，获准后，命张自忠部为总机动部队，驻军徐州。

一九三七年冬，南京沦陷，徐州为津浦、陇海两路的枢纽，为战略要地，日军从华北、华南派遣军中各抽一个师团，于一九三八年年初突破我淮河防线，徐州危急，战区长官部急令张自忠率部增援淮河前线。五十九军乘火车到离前线三十里处下车，部队潜伏在津浦路两侧的村庄里。得知日军指挥部及其主力部队在淮河北岸的蚌埠，淮河两侧堤岸上为

日本的河防部队。日军正在构筑半永久性工事，掩护其部队修复淮河上津浦铁路桥梁。张自忠召集三十八师官兵慷慨陈词说：“现在是我们报效国家的大好机会，对日军作战，只能前进，不准后退。勇敢杀敌的，光荣；怯懦偷生的，耻辱。我带着大家一起同日寇拼死报国！趁日军立足未稳之际，以我军夜战之长，决定今晚十二时以奇袭掏心战术向北蚌埠日本指挥部攻击。首先切断其对外通讯联络，阻绝其向后方的通路，使其指挥失灵。拂晓前攻占北蚌埠。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攻陷日军指挥部后，立即封锁、阻击南蚌埠日军增援，尔后再协助我攻击淮河部队，把日军全部歼灭在淮河北堤岸，夺回友军失掉的阵地。”战斗开始，张自忠亲临前线指挥，官兵们士气高昂，轻装潜行，短兵相接，挥大刀同日军拼杀，把日军杀得四处逃窜，尸横遍野。当场击毙日军指挥官联队长，全歼北蚌埠日军主力部队。拂晓前我军又向淮河岸上的日军发起总攻，日军妄想作最后挣扎，以待来援。此时南岸日军抢渡增援，我军俟其半渡时，用炮火猛烈轰击，日军两次抢渡均未得逞。北岸日军在我军夹击下，全线溃退，遗尸遍地。这一歼灭战缴获敌人大批作战物品，大振了我军军威，大灭了敌人的狂妄野心。这次淝水大捷，各地贺电、贺信传到前线，张自忠抓住有利时机教育全军官兵，他说：“我们要在胜利赞扬声中，找出在对敌作战中暴露出来的缺点，很快地改正，以利再战。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积极训练夜战、近战、大刀战、肉搏战各种战斗方法，迎接未来的大战，把日军消灭掉！”这就是张自忠指挥下的一淝水大捷。

日军为了挽回在淮河的惨败，派板垣师团在徐州东向临

沂进犯，企图切断陇海东段交通，达到进攻徐州的目的。同时津浦北段战况紧张，菏泽外围日军调动频繁，似有攻菏泽犯陇海西段的模样。五战区长官部急命张自忠率部迅速增援临沂，保卫徐州东大门。张率部乘火车经徐州转陇海东段，下火车直奔临沂，冒风雨日夜行程一百八十里到达前线。张自忠见到四十军军长庞炳勋，了解到板垣师团一部已占领临沂北面“茶叶山”，其主力已逼近沂河东岸各村庄。张自忠率部于三月十二日夜，暗渡沂河，拂晓前向日军展开猛烈袭击，日军张皇失措，伤亡惨重，溃退到汤头镇一带，我军乘胜紧追不放。天明后，日军以机械化部队，在飞机协助下应战。张自忠亲自指挥，左冲右杀，逼近汤头镇板垣师团部，命三十八师二二八团向敌巢猛攻。发挥我军近战长处，逐屋逐院攻击，用冲锋枪、手榴弹、大刀片拼杀敌人，经五昼夜，三次拉锯式肉搏，将板垣师团全部击溃，其残部向莒县方向狼狈逃窜。我军乘胜追敌四十余里，敌遗尸遍地。这一战役，共击毙日军四千余人，其中日军校级、尉级军官一百八十多人，击毁、烧毁汽车一百五十多辆，战车二十多辆，缴获大批枪枝弹药，粮秣辎重等军用物资，前线我军官兵士气大振。这是张自忠出师临沂重创敌人的著名战役。

五月初，日军调集大批部队，围向徐州。土肥原师团暗渡黄河侵占菏泽，进逼陇海兰、封一带。第五战区各部队经过徐州会战后急待整补，长官部决定作战略转移，张自忠率部担任掩护任务。张自忠率轻装战斗部队布防在徐州西霸王山一带各据点，以一一二旅设在陇海线何寨一大据点，坚决固守，日军始终未能突破防线，使战区各部得以安全转移。张自忠所部边打边撤，向豫南、鄂北转移。不久奉命急趋固

始、潢川，迎击进犯日军，保卫武汉左侧的安全。在潢川与日军激战数日，击退日军，接着奉命参加大别山的战斗，直到武汉失守，张自忠奉命转移。在通过平汉路花园车站时，与日军激战，方强行通过。在无上级指示混乱情况下，他自动地把三十八师部署在京山县以东地区据守，并指令收容各友军零散部队和落队的伤病员。由于战功显著，十月间晋升为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直辖五十九军、七十七军，守备在鄂北京山、钟祥、襄河一带地区。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上旬，日军为了保住武汉不受我军威胁，调集一个附有炮兵组成的联队，向我京山守军发动突袭。我军早有准备，将主力埋伏在京山郊外鸭子山一带，以少数部队与敌军保持接触，边打边退，诱敌深入到孙桥附近，我一一四团主力发起迎击，敌后方受到我鸭子山部队的尾击，我前后夹击，经过激烈战斗，日军伤亡惨重，仓皇败退，遗弃大批军用物资。十二月上旬，日军不甘心在孙桥的失败，集结了一个师团的兵力，一路沿洋坪、随县向襄河进犯；一路沿京山向我三十八师阵地侵犯。我军以三分之一的兵力固守阵地，以三分之二兵力配置在阵地翼侧，敌军主力向我主阵地攻击时，我军即向敌军侧面发起猛攻，迫使敌军首尾不能相顾，遭到重大伤亡。而在此时，左翼友军经不住日军攻打，致使洋坪、随县失守，友军向襄河撤退。右翼敌军向我钟祥一三二团围攻，在这种险恶的情况下，三十八师师长黄维纲向张自忠总司令提出建议说：“由于友军在左右翼撤退，我军过于突出，部队可否作战术上短距离转移，免遭敌军包围。”张总司令说：“在此关键时刻，要在原地继续战斗，不准移动，后撤不是办法，要知战斗越接近

胜利，困难就越多，我们只有牺牲一切，才能保全一切！要坚定战斗必胜的信心，争取最后胜利。所谓最后胜利，归于最后努力者！”官兵受到很大鼓舞，以勇敢牺牲的精神，拼命冲杀敌军，终于把敌人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取得这一次胜利，完成了掩护友军安全脱离的任务。

一九三九年初，日军凑集约四个联队，分三路向第五战区防地侵犯：一路沿襄河左岸犯新野、唐河、枣阳一带；另一路从信阳进犯桐柏；三路从钟祥、洋梓，沿襄河东岸向襄、樊进犯。五战区以孙连仲兵团固守南阳迎击日军，令张自忠兵团固守襄河，防敌侵犯宜城县境。抽一部兵力阻击钟祥、洋梓敌军进犯襄樊地区，以确保五战区从襄阳至宜昌通往大后方通路的安全。张自忠令三十八师一一二旅杨干三团渡过襄河，在流水沟占领阵地阻击从钟祥、洋梓北窜的日军。日军向我阵地发动猛烈炮击，掩护步兵攻击，我沉着应战，日军以一部向我攻击，保持接触，而主力向襄樊移动。我军立即向当面之敌发起反攻，敌军不支，败退，我军追击敌军三十余里，敌军退却中又遭我三十八师及所属一一二团截击，伤亡惨重。黄师长令一一二团为左追击队，乘夜向田家集方向搜索前进，令一一三团为右追击队，乘夜向田家集以右地区搜索前进。当左追击队前卫营行抵耗子岗时，天已拂晓，发现山下坪内有大部日军正在集结队伍，编排行军序列，张文海团长、高家凤营长看到这一有利时机，立即命令部队，居高临下，给敌人以闪电式痛击，把敌人打得人仰马翻。这次战斗，击毙日军指挥官辘重少将联队长一人，歼敌整整一个联队，缴获战马三百余匹，以及大批军用物资，挫败了敌军，安定了五战区，确保了后方交通畅通。



## 武汉战役痛歼日军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张自忠奉命向日军发动反攻武汉战役，任反攻部队的指挥官。参战部队为五十九军全部、一三二师、七十四师、广西部队莫军长所属一七三师、一七四师，参战人员九万多人，号称十万。日军为守敌第十三师团、一独立旅团、第三十九师团的一部分，以及京山、钟祥、随县三地的汉奸队伍，参战人数约八万多人。

张自忠令三十八师进驻龚家畈一带，对黄家集敌人进行详细侦察；令七十四师进驻王家台子一带，监视黄家集通往洋梓间公路日军动态；令一七三、一七四师进驻高坡一带，监视洋梓方面日军动态；总部及直属部队进驻张家集；一三二师驻张家集以东地区，负责总部左翼安全，监视随县方面日军动态；一八〇师负责总部右翼安全。各部队到达指定地区后，积极训练夜战、近战的战术。

各参战部队经过有计划的短期紧张的训练和对敌情的搜集及分析，作出了周密的作战计划，拟定在十二月上旬发动攻势。以三十八师为主攻部队，攻击目标为罗家陡坡、万水寨，攻占两地后，立即向黄家集日军师团部攻击，尔后进击董桥，切断钟祥、洋梓两地日军退路，把日军十三师团歼灭在董桥附近，继续向京山、汉口挺进。我第三十八师进攻部署如下：以一一二团（张文海团）主攻罗家陡坡，乘夜半时刻袭击敌人，限拂晓前攻下罗家陡坡敌人阵地，攻占后继续向黄家集推进。以一一三团（杨干三团）佯攻万水寨，牵制敌人，掩护主攻部队左翼安全。经过半夜激战拼死冲杀，于次日晨八时，全歼罗家陡坡日军。我一一二团三营营长阵

亡，张文海团长令第二营（刘文生营）换下第三营，继续向黄家集推进。此时黄家集日军派出大批部队层层设防，阻止我军前进，在黄家集、罗家陡坡间展开激战。同时日军又调洋梓日军侧击我主攻部队右翼，牵制我一一二团前进。在此紧急情况下，三十八师师长令一一四团（樊仑山团）在夜间攻占日军洋梓、黄家集公路上据点观头山阵地，阻绝两地敌人的交通线，策应我主攻部队，攻击顺利进行。观头山战斗是樊团栾升堂营向戒备疏忽的日军发起突然袭击而占敌阵地的。敌人于次日晨八时，约有炮兵、步兵二千多人，向观头山反扑，先以炮击六、七小时之久，掩护步兵进攻，我沉着应战，敌军遭重大伤亡，未能得逞。日军又从洋梓调来一部分部队，对观头山我军阵地三面包围，连续作战，轮番不停。经七昼夜激烈争夺战斗，敌军被我军击退，龟缩在洋梓死守。我军栾营由于伤亡重大调到第二线，白总部补充团一个营拨归栾营充实训练，同时令一三二师任廷材团归三十八师指挥，接替一一二团防务，令一一二团到师部附近地区整补训练。

十二月下旬，日军新调来的独立旅团向我七十四师阵地攻击，威胁到我主攻部队右翼的安全。三十八师师长令一一三团、一一四团于当日夜协同出击，收复了七十四师失掉的阵地，确保了罗家陡坡右侧的安全。复由一一四团二营（刘同福营）为主攻队，一营（金文陞营）为助攻队，三营（栾升堂营）为预备队，进攻王家台子以南地区各村落，第一线营需与一一三团第一线营密切配合，协同作战。一一四团团部预备队行抵王家台子时，听到王家台子西方有三八式枪声，预备队营长率部队占领了王家台子西面高山，向密集在西面八百公尺远的平顶山日军进行突然袭击，给敌人以沉重

打击，当场击毙敌独立旅团长。次日上午十时前后，敌十三师团一部附山炮多门，在大批飞机掩护下，向我军阵地反扑，经三昼夜激烈的争夺战，把敌人全部击溃，清扫战场时，总共敌人遗尸三千二百余具。由于在张自忠指挥下的部队取得极大胜利，张自忠被晋升为右翼兵团总司令。经此次战役，张自忠奉令守备在鄂北襄河沿岸地区。

以上为张自忠将军在一九四〇年牺牲前的事迹，关于张将军殉国情况，鉴于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有《张自忠将军殉国纪实》（李致远著）一文，我不再赘述。

我是张自忠将军的学生，又是他的同乡，直接追随张将军达数十年之久，他在一九四〇年五月十六日，于湖北宜城南瓜店山中，抗击日寇壮烈牺牲，距今已四十三年了，抚今思昔，百感交集。谨将他牺牲南瓜店前事迹，作一回忆，以资缅怀。

一九八三年七月一日

于南京龙池庵





## 怀念战友尉迟修职同志

张 如 三

尉迟修职同志，山东临清市白布巷人。他和我是高中时的同学。一九三四年秋至一九三六年秋，我们在当时的河北省立北平高级中学同一年级读书，他在乙班，我在丙班，因不在一个教室上课，也不在一块住宿，故不很熟悉。后来在伟大的“一二·九”运动中我们俩才结成了患难与共的战友。

自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以来，我们俩一直在一块战斗。对他的思想品德，我很钦佩。一九三八年五月，在京郊因反对叛徒李望东投敌，被其杀害，牺牲时年仅二十一岁。他虽遇难四十多年了，但他的言行，他和蔼可亲的形象，犹在我的眼前。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爆发了著名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当时，我们学校是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委员焦实斋任校长，对学生控制很严。他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不准学生谈抗日救国，只让学生埋头读死书。因此，游行示威的消息，事先我校一点也不知道。只在当天上午九点多钟，我班正在上课，突然从外面跑进来十多个学生，在我们教室外面大喊大嚷，动员同学们放下书本，走上大街，参加游行示威，抗日救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同学们都很兴奋，有爱国热忱的青年人都想上街，但被学校当局制止了。只有数名同学瞅空跑

出去参加了游行。其中是否有爱国心很强烈的修职同志，不得而知。因我被学校当局制止，未能出去。当天晚上由各种渠道传来了游行情况，令人振奋，有强烈爱国心的同学们再也不愿读死书，坐以待毙了。过了几天传来了“一二·一六”要组织更大的游行示威的消息，有些同学就暗暗下定了要去参加的决心。

十二月十六日一早，我和修职等十几名同学就分别走出校门，找到了游行队伍，到前门外参加了反对华北“自治”、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大会。会后随浩浩荡荡的队伍游行。直至下午五点左右被警察打散才回校。参加了一天伟大的群众运动，我们受到深刻教育，胜读十年书。“一二·一六”以后，我校爱国同学们冲破了学校当局的控制，组织了学生会，在寒假期间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想不到，在一九三六年二月初开学前，学校贴出了一张布告，把我们学生会的领导人袁心纯等十名委员（都是我们上一级的同学）开除了。同学们看了布告，非常愤怒，“抗日有罪吗？”“为什么不许爱国？”大家要求学校收回布告，挽留被开除的同学。学校当局的态度，异常强硬，不仅不收回布告，而且勒令被开除的同学立即离校。这就激起了约二百名左右的同学随被开除的袁心纯等同学一齐离校。几天后，我们参加了学联组织的返校斗争。这一斗争，以郭清等同学被捕入狱，被北平市当局镇压下去了。从此我校救亡运动进入低潮。

但人民群众是按我们党的“八一”宣言所指引的方向前进的，是国民党的卖国投降政策所阻挡不住的。我们党为了把人民群众进一步组织起来，就深入群众做过细的工作，蓄积

和壮大抗日爱国力量。不久，就有高三的于辛、陈一震同学和修职联系，提出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修职又联系我，我俩都赞同，就加入了这个组织，于是就秘密组成了我校民先队。不久，我们民先队扩大到二十来人。我们每星期要到陈一震同学家开一至二次会。在学校宣传抗日救国道理，联络爱国进步同学，扩大抗日力量。

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三日举行了抗日救国游行示威活动。由于当时全国抗日形势的高涨，由于我们民先队在校的活动，和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的支持，我校再次成立了学生救国会。修职和我均被选为委员，我担任主席。出人意料的是，

“六·一三”那天早饭后，我们学生会召开全校学生大会，除个别人外，几乎都到了。于辛同志在会上做了简短的动员后，全体同学一致响应，就连学校当局在学生中发展的那些国民党党员和一些读死书的同学，也都没有提出反对的意见。于是，全校同学整整齐齐地排成四路纵队，从我校后门开出去。路线是经过地安门大街，景山西街，直到长安街和北京大学的队伍汇合，然后往西单大街游行。当队伍走到北长安街南口时，被警察和保安队挡住了去路。当于辛、修职和我向警察交涉放行时，突然街道两侧的警察、保安队向我们袭来，皮带、竹竿、警棍、加上拳脚，劈头盖脸打得同学们头破血流，鼻青脸肿。有的同学被四、五个警察抓住四肢，往马路两旁的石条上摔，使同学受了重伤。游行队伍被军警冲散。我们边跑边喊，号召同学们到西单集合。当我们躲过警察追捕，跑到西单时，只集合了十多名同学，参加了游行大军。天黑以前，我们回到学校后，立即组织了对负伤同学的慰问。晚上焦实斋把我和修职同学叫到办公室，大发雷霆，严

厉训斥。但他对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国民党当局的暴行毫不责怪，却说我们拿同学们性命闹着玩，不安分守己上学，破坏了学校和社会秩序，并要我们赔偿同学的损失。我们说：

“抗日救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是光明正大的，有什么罪？”他也无可奈何。

此后，我们学生会的工作还继续进行，学校当局为了把如火如荼的学生爱国运动镇压下去，接受年初开除学生的教训，不敢用硬的办法，就采取通过暑期会考办法，把搞救亡运动的学生甄别出去。他们认为凡是搞救亡运动的学生，功课都不行，只要严格考试，就不及格了。开除他们名正言顺，就不会激起其他同学们的同情。这对救亡运动的打击最厉害不过了。我和修职同学看到了这一点，我们约定要使他们的阴谋不能得逞，于是我们一面抓好学生会的工作，一面努力复习功课。七月中旬放暑假了，修职和我都没有回家，共同在北长安街北口路西租了一间民房住下。一面学习革命书刊，复习功课；一面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同时等待学校发通知书。不久，通知书来了，我们俩各门功课都在八十分以上，身体都是甲等，只是操行不及格，被开除了。我们道德品行端正，并没违犯任何校规法令，为什么操行不及格呢？这就是说学校当局并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还是以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作为罪名，开除了我们。据说同学们在看到学校开除我们的布告后，都很气愤，大骂学校镇压学生，进一步揭穿了焦实斋等甘做蒋介石降日卖国的面目，更加激起了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就在这时候，党派了于辛同志来分别介绍我和修职同志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我们已被开除，于辛同志多方协助，特别靠修职同志的活动，买了两张假的修



业证书，又找了一位中学教员做担保，才考入了私立镜湖中学，才有了干革命的立足之地。

到镜湖中学不久，我和修职同志都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了。那时北平市党员很少，镜湖中学无党员，党指定我和修职同志建立了党支部，我为书记，他是副书记。我们在学校中积极从事党的工作，发展民先队员和共产党员。到一九三六年双十二事变时，我们已发展了十名左右的民先队员，还发展了两三名党员，成立了民先中队部，由修职同志任中队长。一九三七年上半年，我们继续发展党员和民先队员，并在参加全市抗日救亡运动中，在和学校的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中，镜湖党支部不断坚强起来，成为当时北平西城区坚强的领导学生运动的党支部。

“七·七”事变以后，修职和我遵照党的指示，立即拿起枪杆子走上武装抗日的道路。我们先后由党组织介绍到北平郊区参加一个刚组织的游击队。

我们参加的游击队叫国民抗日军，是东北抗日总会（进步团体）派人组织起来的。为首的赵桐是个青年党分子，下面的干部、骨干绝大多数是东北人。其中有东北的流亡学生，旧军人，也有当过土匪的，成分比较复杂。我们由北平党组织派进去的几个党员是秘密的。队伍一共才三、四十人，修职和我刚进去都当兵，都参加了打北平德胜门外第二监狱的战斗，解放了几百“犯人”，扩大了部队。这些犯人中有“政治犯”（即被国民党抓去的共产党人）、抗捐税暴动的农民，他们参加部队打日本是坚决的，后来多数成了骨干；但也有抢劫犯、杀人犯等。后来这个部队在平郊还吸收了不少农民，还吸收了一些被日寇打垮了的冀东保安队和国民党军队的散

兵。这样部队成分就更复杂了，竟出现了抢劫、敲诈勒索、战场上打黑枪等现象。但部队基层骨干多是进步的坚决抗日的青年学生，特别有我们几名党员起作用，还能使部队在战斗中不断前进。环境逐渐艰苦，一些假抗日，真发财的投机分子、土匪、流氓、兵痞等坏人不断自然淘汰。一九三七年九月底，我当了排长，修职就在我排二班当班长。我们在战场上相依为命，共同战斗。一次，整个部队遭敌人夜间袭击，上级指定我排为后卫，掩护部队撤退。我们上山以后，敌人从我们左前方包抄过来，我命令三班占领我们上面那个山头。班长（原东北军的兵痞）不仅拒绝执行命令，反而突然推上子弹对准了我的胸口，在此紧张时刻，修职挺身而出制止了他。我怕打起来，就改变命令说：“三班长不愿去算了，由二班去占领上面山头。”我的话一落，那个三班长把枪一收，就向后转临阵脱逃了。修职同志则二话不说，带领全班人占领了上面山头，完成了掩护任务。此后，我们在北京西郊打了许多仗，他在战斗中表现很勇敢。冬季部队进入平西山区，生活很艰苦，只能吃到小米饭，天气冷了没有棉衣，没有被子，晚上只凭烧热炕取暖，部队情绪不好，还经常行军打仗。修职同志对革命事业忠诚积极，协助我掌握思想情况，管理部队，保证我排顺利完成了各项任务。

我们在这个部队中的几名党员，说服了当时部队的头头赵桐，接受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同志来信的邀请，十二月下旬部队离开了平西山区，到了察哈尔省蔚县和八路军杨成武支队会合。至此我们几名党员都感到是回了老家，半年艰苦奋斗，没有白费，总算为党争取了一支装备良好的、有战斗力的部队，心情甚为宽慰。一九三八年一

月份，我们进一步说服了赵桐等人，接受了改编，编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正式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一支武装部队，正式建立了政治工作，我被任命为我连（即一连）政治指导员，修职同志接替我当了一排长。三八年二、三月间部队在河北灵寿、正定一带执行破击平汉铁路并扩军任务时，修职同志被任命为三连指导员。至此我们俩就分开了。虽同在一个营，但各自带领一个连执行任务，常不在一起。

三八年四月初，部队奉命开回平西山区建立根据地。我们营部守家。一、三连就分散去开辟根据地，发动群众，建立政权。修职同志带三连到房山县一带，我带一连到了涿州东北地区。我们相距数百里。三连长李望东是东北旧军人，旧社会的油子，据说还在东北当过胡子（土匪），虽一时投机混入党内，但本性未改，吃喝贪污，私人拉拢，在连里和司务长狼狈为奸，暗中反对政治工作。还和我连连长王木贵结成把子弟兄，王是冀东人，是我们打第二监狱解放出来的一个抢劫犯，也一时投机混入党内，他们披了党员的外衣，使我们丧失警惕。虽然当时连队都建立了党支部，我们两个连各有二十名党员，但让这些坏人掌了权，在党员中缺少教育，觉悟不高的情况下，坏人可以乘机为所欲为的。修职同志忠厚老实，待人诚恳，看人只往好处想，缺乏防人之心。对李望东平时经济手续不清，吃吃喝喝，拉拉扯扯，抵制和暗中破坏政治工作等恶劣行为，只认为是思想意识作风上的缺点，没有看到其土匪本质。因此在赵桐叛变投敌后，领导决定很快收拢部队，命令三连由房山地区撤回司令部驻地。李望东可能是听到了赵桐叛变的消息，也可能怕回去后，清查他贪污腐化的问题，就和司务长密谋把部队拉到山外去投

敌或自立山头当土匪。此情修职同志未发觉。就在部队夜间行军的路上，被叛徒李望东杀害了。李望东杀害修职同志后，用枪威胁连队直奔我连驻地而来，竟欲和我连连长一起裹胁我连去投敌。司令部一面派我们营长带二连去追李望东，一面派人给我送信。我得悉后非常震惊和难过。我一面在党支部做了布置，提防我连连长异动；一面作了战斗准备，如李望东来了，要坚决消灭这个叛徒、刽子手，给修职同志报仇。过了几天，我连也奉命调回，才知道二连在大安山把李望东包围。经过喊话教育，二连党员觉悟过来，动手把李望东和司务长打死了，为修职同志报了仇，全三连同志都回到了党的怀抱。

以上是我所了解的修职同志的革命事迹。修职同志短暂的一生，为我们民族的解放、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 忆若仙姐

黑伯理

〔按：黑若仙同志（又名黑丽卿）临清市前关街人，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我市最早从事革命活动的女同志。〕

黑若仙同志，山东省临清市人，是抗战前入党的老党员，牺牲时三十三岁。她是我的同胞姐姐，我们生长在一个贫苦的市民家庭里，生活十分困难，经常有断炊的危险。自幼的贫苦生活，不仅锻炼了她的革命意志，也培养了她的坚强性格。她自幼爱读书，尤爱读进步的书籍和刊物。一九三六年在临清县六县联立简易师范毕业。毕业后就在本县第一完全小学任教。她热爱教育事业，对学生除了讲授课程之外，随时注意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思想。在她的影响下，她的不少学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和我的胞兄也是如此。当我十二、三岁时，她给我介绍的第一本进步小说就是《少年漂泊者》，读后对我确实起了不小的教育作用。

她在完小任教期间，同李葵元、颜竹林等同志（都是共产党员），除了向在校学生进行革命教育外，还对校外青年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课余时，并与本市尉迟修职、王毓麟、尉迟修芬等同志组织地下巡回图书馆、时事座谈会，秘密地进行革命活动。

“七·七”事变后，日寇陷平、津，侵占沧州，她便积

极地与丁浩川、李葵元、颜竹林、家兄溪月等，共同商讨组织游击队，坚持游击战，抗击日寇侵略。由于日寇沿津浦线南侵，到达山东北面的门户——桑园，华北形势已极度恶化，国民党军南逃，地方官衙溃窜。这时他们又和上级党组织失掉联系，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寇侵占临清县城前夕，若仙姐带领我们暂时转移到乡间，经同志们商量，让在乡村与群众有较多联系的同志，如颜竹林、姜冠三等留在当地组织游击队，其他外地人如丁浩川和我们几个家在城里的同志，都到山西临汾八路军游击干部训练班去，或者径去延安，那时若仙姐坚决要和我们同去。她的体质很弱，路上又有危险，父亲、母亲、溪月哥和我都不同意她去。母亲说：“你怎能跟得上他们呢？”但她却非常坚决而又严厉地驳斥我们说：“你们为什么把事情看得那么困难？把死看得那么严重？难道出去参加工作就一定会死吗？”她坚持自己的意见，非去不可，因之谁也不再与她辩驳，只得让她同我们一块去。

当时由于日寇已控制了平汉线北段，过铁路线很不方便，我们只好步行到泰安，然后再经陇海路西去。当时人慌马乱，溃兵沿途流窜，她却满怀信心，向往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迫切心情，使她忘掉了一切，什么爬山越岭、路途遥远，都未放在她的眼里。

到了泰安找到山东民先总队部，当时负责人是孙陶林同志。当我们向他讲明要西去的愿望，孙陶林同志劝我们留在山东工作，以便争取山东省主席共同抗日，我们同意了，他便介绍我们去到济南，参加了第三路军政训处（即平津流亡学生的集训处）工作。该处是由张郁光、齐燕铭等同志主持

工作的。

济南失守前夕，我们奉命撤离，夜间乘军用列车开往济宁，时值严冬，车无棚顶，北风凛冽，一路上寒风刺骨。有的刚从学校或家庭出来的青年们，感到难以忍受了，但若仙姐对此毫不在意，从未说过一个“苦”字。我们在济宁住了一周，又转移到曹县去。夜间我们徒步出发了，这对全体学员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行军中，她的脚打泡了，体力也有些难以支持了，我便扶她慢慢地走，并劝她说：“我看这样下去，你真受不了，不如到靠近考城时，我把你送到一个亲戚家，停下来吧！”她听后非常恼火，严厉地对我说：“你这是什么话？这样困难在战时是不可避免的，打起仗来在前线就那么容易吗？这是应该受的锻炼嘛，你愿意扶我更好，不愿意扶我时，那也不要紧，我自己也能坚持赶上去。”我当时被说得没话答对，只好依着她。

一九三八年初，聊城六专区范筑先将军派人到政训处要干部，那时她首先报名要到敌后去工作，因此，我们四人（包括我爱人王震凡）一同到了山东第六专区。报到后她和王震凡被省委代表张霖之、特委书记徐运北同志派往东阿乡村开展群众工作。一九四六年为她召开的追悼会上，东阿西城铺村的苏群同志还说：“一直到现在，那里的妇女们还经常向我打听若仙同志的消息，大家还在深深地怀念着她。”

一九三八年春，组织上派她到冀南区党校学习，结业后正值日寇从临清县城撤离，她被派到临清，与李蕴华等同志一起组织临清县妇教会。在党的领导和她的带动下，很快就四十多个青年知识妇女参加了工作。其中有不少是她的学生，如赵鹏、赵春英等同志。妇教会是当地最活跃的群众团

体，在“拥范(范筑先将军)拒胡(国民党的专员胡学仁)”斗争中曾起了积极的作用。

日寇二次侵占临清县城后，她和该会部分干部随同县领导同志王笑一等转移到城北十八村一带，开展群众工作。后调一地委妇委工作，一九三九年春随八路军先遣纵队东去，开辟泰西根据地，参加了有名的琉璃寺战斗。战斗结束后，部队疏散机关人员，若仙同志和刘慧溪、赵春英等同志去冠县。回忆起她的生活，赵春英同志在追悼会上说：“路上尽管敌情十分严重，但是若仙同志还是不断地和我们谈学习、谈工作。她非常关心我们的生活，热情地照料我们生活。有个房东老太太竟对我们说：‘你们娘儿三个干啥去啦？’人家不知道我们是什么关系，只见到她对我们的体贴爱护，就认为是我们的母亲。的确，没有黑老师对我的帮助，今天我也不会走到革命阵营里来，人家说她是我的母亲这并不过分！”

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她任一地委宣传科科长，负责编党内刊物《洪流》与《抗战日报》。回忆当时工作情况，丹彤同志说：“若仙同志在修改稿件的时候，是非常负责的，真是一丝不苟，修改的地方过多了，就再亲自誊写一遍。”

她一九四一年初调到专区文联，一九四二年调到卫东中学担任教员，担任国文与政治课。在敌人不断地“扫荡”袭扰下，她不顾个人身体的病弱，与其他男同志一样地野外露宿，白天照常上课，与师生同甘共苦。一九四三年春又调回地委编审科，负责编辑《堡垒支部》等刊物，后因她愿意提高与充实写作能力，经组织同意，调专区抗联分会，任妇女部副部长。



一九四三年八月间，冀南与冀鲁豫合并，调干部整风，她主动要求去学习。当时地委考虑到她体弱多病，通过敌占区有实际困难，未允许，但她竭力要求，终获批准。第一次出发，恰遇上日寇在平汉线一带“扫荡”，未能通过而返回。第二次她又坚持要去，因在路上患了疟疾，被迫又折回，住在冠县大里村，但就在这时候碰上严重的大灾荒，霍乱流行，她患上霍乱，夺去了我姐姐生命。去世的当天——四三年十月十四日上午，她还和好人一样，紧张地审阅文件，修改文稿，正午还亲自去采树叶，和上麸子蒸菜吃。但到晚间霍乱突然发作了，肠胃剧痛，吐泻不止，一直闹到第二天凌晨，终于心脏停止了跳动。那时我正在冠县北部督征公粮，闻讯赶到时，已是我敬爱的若仙姐入墓前的一刹那了。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日在临清市召开了若仙同志的追悼会，会上我介绍了她的生平事迹，一说到“若仙同志是个平凡的人……”这时张延积同志插话反驳我说：“若仙同志是一个很不平凡的人，她的斗争勇气与埋头苦干的工作作风、刻苦的学习精神，都是非常出色的。她的死是党的损失，我们应该为完成她的未竟事业而奋斗，只有这样才对得起死者。”

若仙姐的一生，确实是战斗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天灾敌祸过早地夺去了她的生命，我要为她的未竟事业而献出自己的一切。

一九四六年冬初稿

一九七九年稍加修改

# 一九三八年的片断回忆

韩多峯

## 一、出任山东第四专署专员

一九三八年五月，徐州失守不久，我正在故乡东平养伤，沈鸿烈（当时的山东省政府主席）由曹县到了东平。这时，他所委派的山东第四区（临清地区）专员曾琦和国民党特务张继尧等人，因为在鲁西北地区搞阴谋活动，被范筑先的第三支队驱逐出境。沈鸿烈便要我继任山东第四区专员。我估计他有两个企图：一是用我做他的枪头，到鲁西北与范筑先和共产党人搞磨擦；二是利用我和范筑先有些私人友谊，给他做个缓冲的桥梁，等局势稳定了，再把我踢开。因此，我没有马上答应他。回来跟徐铁生等人一说此事，他们一致同意，认为这样可以名正言顺地深入敌后开展抗日活动。于是，我决定赴任。

沈鸿烈只给了我一张委任状，既不发给我一枪一弹，也不发给我一文钱。但为了抗日救国，我和徐铁生等坚持抗战的青年朋友克服了重重困难，由东阿过黄河到了聊城。那时，范筑先将军刚在威县同八路军一二九师徐向前副师长会晤回聊城不久。我受到他的热情接待。他介绍了一批干部帮我去开辟工作，其中包括赵效三、朱穆之等八位青年。这些干部

帮助我组织了政治部（赵效三任主任），以利于开展宣传抗战和组织群众工作。范将军还派他仅有的一部大卡车送我到专署所在地——清平县城赴任。临行之前，《抗战日报》（共产党人在聊城办的报纸）还派记者访问我，发表了我的“施政方针”，登在了第二天的报纸上。离聊城时，范将军和张郁光、齐燕铭、姚第鸿、赵以坪等同志，亲自把我们送上汽车。

## 二、调解争端

我在清平就任的第二天，以临清县商会会长李耀堂为首的七八个临清代表就来找我。临清原来是山东省第四专署所在地。这时驻临清的军队有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纵队陈再道部，有当过日伪“皇协军”后又反正的吴连杰部，有清平、夏津一带有名的土匪头子、绰号“二皮脸”的冯寿彭的部队，还有已接受范筑先改编的第十六支队吉占鳌部。冯、吴、吉的部队曾在临清市区要塞路口架起机枪，阻止八路军在市区的行动。双方随时都有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代表们对我说，临清原是四专署所在地，新任专员应当搬到那里去办公，以设法缓和双方的矛盾。有人在恳求我时都流下了眼泪。我在清平立即给临清县长打电话，请他劝说双方千万不要发生冲突。接着我就骑自行车去临清。

我首先到了麻佛寺冯寿彭的司令部。冯寿彭常用鸦片烟待客。我虽然不会吸大烟，但也躺在烟榻上和他攀谈。我开头就问他：“你为什么要跟八路军过不去呢？”他把烟枪往床上一扔，站起来说：“八路军欺人太甚！我非跟小舅子们拼不可！”

冯寿彭这人独霸一方的思想很严重，要想从正面说服他是不容易的。我便变换方式从其他角度同他攀谈。

我问他：“你是清平人吗？”

他说：“当然喽。清平是我祖祖辈辈生养死葬的地方。有人想把我赶走，是办不到的！”

我又问他：“这样说，你在临清的亲友也一定很多了！”

他说：“临清和清平是邻县，两县的人来往甚密，那里的亲友也是不少的。再说，近些年来，我在社会上多少有点名气，两县的人差不多都知道我，都听我的。八路军要进驻临清，只要我不点头，他们就甭想驻成。”

我说：“这样说，你在地方上是很有威信的了。”

“那不假，”他有点得意。

我说：“果真如此，这个仗是万万打不得的。打败了，自然对你有损；就是打胜了，对你也是得不偿失，等于打了个太败仗。这是个赔本仗，万万不能打。”

他问：“这话怎么讲呢？”

我解释说：“有句俗语叫做‘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你想，打起仗来，不仅炮火无眼，人会伤亡，而且部下的纪律也很难控制，烧杀抢掠，在所难免。人民遭受苦难，要寻根究底，如果知道了这个仗是你领着打起来的，人民群众要骂你的祖宗的！你在地方上的威信将一扫而光。你的亲朋好友，也会骂你的。这不是胜了也等于打了败仗吗！”

他听后沉吟不语，过了一会才说：“你讲得有理。”

我紧接着对他说：“你想打仗吗？倒是有个地方，有个仗很值得去打。打胜了当然很好，打仗求的就是胜嘛。即使打败了，对你来说，也等于打了个大胜仗。”

他急忙问：“真有这样的事吗？这个地方在哪里？”

“在东阿。我最近听说，沈鸿烈在东阿受到日军围攻。你如率兵急去支援，定可把日寇打败。沈是山东省主席，一定会大大嘉奖你，报纸上也一定用头号字标出你的名字，称你是抗日英雄。即使仗打不胜，沈也会感激你对他的支援，要表扬你，授给你名义，那时你就成了正式军队，再不是自封的游击司令了。你的队伍的粮饷有了着落，不再自己作难，这不是收了也是胜了吗。”

他听了之后很高兴地说：“我这个高粱棵毕业的好汉，还能有这点出息吗？”

我说：“唐朝的鲁国公程咬金就是东阿人，他不就是绿林大学出身、响马传上有名的英雄吗？你也不能小看自己！”

我的这些话使他听得眉飞色舞，立即下了决心说：“好吧！我一定离开这里去东阿打鬼子！”

第二天早上，他套上了双套轿车去临清。上车的时候他让我坐在车厢里，自己坐在外边跨辕上，直奔临清城。在临清城郊，早有城里的几千群众在列队欢迎。吴连杰、吉占鳌等人也都来了，路上还有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纵队和临清战地动员委员会贴出欢迎我的标语。

进城之后，先到吉占鳌的住处。看样子冯寿彭已经把我劝他不要打仗的话转告吴、吉二人了。三人之中冯的势力最大，吴、吉不敢不听冯的话。冯二皮既然表示不愿打仗，吴、吉二人也就老实下来了，他们表示听从我的意见。这时我觉得有了初步的把握，就立即渡过卫运河到河西，会见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纵队司令部的领导人。我被引到客厅里坐下，由一位姓苏的同志出面接洽。我说：“为了团结抗日，请你

们不要同冯寿彭等开火。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是八路军提出的口号，如果打起仗来，那么提出的口号就不算数了。”苏同志说：“这不怨我们。我们是反对打内战的。这伙土匪非要打我们不可，我们怎能静等着挨打呢！”我说：“冯对此已有了认识，他已准备离开临清了。”苏同志说：“冯果真离开临清，那还有什么说的。大敌当前，我们还是要讲团结的。”我说：“既然你们也同意不打了，我一定动员冯早日离开临清，你们再听我的信好了。”

回到河东，我将从第五战区司令部领来的五千元活动经费，分给冯寿彭三千元，叫他作为开拔费。冯接到这笔款子，非常感激，对我说：“我当天就走，绝不再向地方上索取分文。”稍停了一会，他就出去集合队伍，向东阿出发了。

吉占鳌早已接受了范筑先将军的改编，只有吴连杰部尚无归宿。我决定把他们改编成专署直属的保安队，并叫他们贴出标语向八路军表示友好。

我本来打算回清平去，临清的群众代表再三要求我驻在临清，以防发生其他变化。吴连杰也愿意把他的司令部改为我的专员公署，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纵队也欢迎我留在临清，我只好同意了。

第二天，我又出面请三方（国民党县政府、吴和吉、八路军）领导人同桌吃饭。饭后，取出临清县地图，大家共同协商划分驻区，互不干扰，还共同拟定出夜间的口令，免得发生误会。

后来，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纵队的陈再道司令员也从河西搬过来，我们时常往来见面，并共同派出部队去破坏被日寇侵占的津浦铁路，运回来很多钢轨，成为我们制造武器的

材料。聊城《抗战日报》曾专门撰文宣传过此事。

### 三、广泛的群众抗日活动

由于我的专员公署内有不少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在宣传抗战组织群众方面做出了不少成绩。他们会同东进纵队工作团和临清战委会，组织起各种群众抗日团体。先后组成了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回民等各阶层的抗日救国会。甚至连临清公娼区受侮辱、受压迫的妓女也被组织起来，以抗日爱国思想启发她们。这些引起了以沈鸿烈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的憎恶。沈曾对人说：“范筑先已经把山东搞红了半个天，现在又加上了个韩多峰，这还了得！”

一九三八年七月下旬，延安文艺工作组的刘白羽、欧阳山尊、汪洋等同志，偕同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一位同情中国抗战的卡尔逊少校，由陕北转道冀北、冀中、冀南，于七月二十到了临清。我曾带领当地群众和八路军一同在卫河码头上欢迎他们。后来，安排他们住在美国人开办的华美医院里。第二天上午，临清人民举行了几千人出席的欢迎大会。卡尔逊在大会上说：“武汉有的报刊，说中国北半部都成为日军占领区，地图都变了颜色。我走了三省边界之后才知道那全是谎言。原来华北敌后有大量抗日军队、抗日政府和抗日人民。”

第三天，我设宴招待卡尔逊和延安文艺工作组的同志。

### 四、出席南宮国共两党的军政联席会议

一九三八年中秋节之前，鹿钟麟带着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书记长韩梅岭和以后当了汉奸的孙良诚等人，由武汉转道晋

东南到了南宮，着手组织国民党河北省政府和冀察战区长官司令部。名义上是搞“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其实是想在这个地区制造磨擦。

此间，我曾到南宮，受到各方面的热情接待。沈鸿烈得悉后，打长途电话告诉我：不必急于回临清，要在南宮等他，有要事面商。他趁机秘密地办理好了撤换我的文件，并到临清当众宣布调我任“山东省保安处长”。

在南宮，我参加了八路军一二九师和冀南行政公署所召开的欢迎冀鲁两省军政人员座谈会，主人方面是中共北方局朱瑞、李菁玉；一二九师徐向前副师长；冀南行政公署主任杨秀锋、副主任宋任穷等同志。客人方面是鹿钟麟、沈鸿烈、范筑先、张郁光、姚第鸿和我。会场上悬挂着欢迎沈、范莅临的标语。鹿钟麟陪着我们入座，杨秀锋是会议主持人。鹿、沈坐在中间，徐向前副师长、范筑先和我坐在两边。鹿在会上首先对沈恭维了一番，沈也表示是来向鹿和徐、杨诸位学习的。接着范筑先将军讲话。他说：“去年初冬，鲁西北外有日寇压境，内有土匪捣乱，我们可以说是孤军抗战。后来，来了个朋友八路军，同我们守望相助，团结御侮，增强了我们的勇气和决心。”范讲完之后，我很激动地站起来发言。我把沈鸿烈收买地方部队脱离范筑先，破坏团结抗战，密令滕梅五不发给八路军和临清抗日团体给养，限制组织民众抗日团体，妄图取消“战委会”；蓄意制造磨擦等事件都一一当场揭出来，引起全体与会者的热烈鼓掌。徐向前副师长讲了如何坚持执行“抗战建国纲领”、如何改善人民生活以及如何正确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杨秀锋和韩梅岭也讲了话。中共北方局的代表朱瑞同志最后发言，他表



示同意加强上层合作的意见，提出冀鲁两省如何加强合作抗战的问题。会场上的一切，今天回忆起来仍然历历在目。

当天晚上，沈鸿烈找我谈话，约我明天一道回鲁北惠民。他说：“你在会上的发言，使我太难堪了。如地上有缝，我非钻进去不可。”我说：“请你原谅。我失去了抗战报国的机会，能不着急吗？”我当场表示不就任“保安处长”。

他对我在临清的政治影响仍然不放心，对我说：“你回去时不要再经过临清了。如果那里接待你太热情了，会使新任专员面子上不好看；如果对你不太热情，你脸上也无光。”我说：“你可以放心，只有冷淡，不会热情。我决定不再经过临清了。”

范筑先将军在南宫时，受到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而沈鸿烈却受到冷遇。这在两个不同的标语上就能看得出来：一边是“欢迎劳苦功高的范司令！”；一边是“拥护沈主席抗战到底！”显然是人民在告诫沈不要中途妥协投降！而沈鸿烈却厚颜无耻地对人说：“你们欢迎范司令这么热情，却不知道我还比他大两岁呢！”听到的人们无不嗤之以鼻。

范将军是比我早几天离开南宫回聊城的。这次的南宫之行，加深了以沈鸿烈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和以范筑先为首的抗战派之间的矛盾，因而他们采取了卑鄙的手段，来对付范筑先将军。

## 五、平息“忠孝团”暴乱

我被罢了官，便住在南宫八路军招待所里。有一次，我对徐向前司令员说：“我是抗日救国有罪，被罢的官。专员

尽可以不当，抗日不可不抗。国民党不要我，我就留在你们这里不走啦。我跟着你们打鬼子，请你答应我的要求。”徐说：“你虽不当专员，可仍旧是国民党的将官，有权过问国家大事。目前，有人想投降卖国，竭力破坏我们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我们更要加强团结，一齐跟内奸外敌斗争。你留在国民党内，发挥的作用会更大。”我听他这么一说，虽然感觉有理，但因为对八路军已产生了感情，不愿离开，是去是留，心中正在犹豫。不料范筑先将军给我拍来电报，说东平县日伪县长侯子良把我的老母亲掠去，叫我迅速返乡救母。我当时的心情正象《三国演义》上的徐庶听到老母被曹营劫去一样，“今失老母，方寸乱矣”，便急忙赶回东平去了。

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回到东平。欣喜的是母亲已经安全脱险，住在阳谷县张秋镇，正准备回家。

原来日伪县长侯子良曾听过我宣传抗日的讲话。当他知道所掠的老人是我母亲时，良心受到谴责。时值天寒，他给我母亲做了件新棉袄，表示慰问，还给我写了一封表白信。信上说：“我听过你的讲话，可没有照你说的去做，感到很惭愧。今天又使老人家受凉，愈觉不安。除向老人家道歉外，还请你谅解。我决心改正自己，请看我以后的表现吧。”他把我母亲送到张秋镇。

范筑先将军得知我母亲脱险的消息后，曾派人带了礼物去慰问。隔了一天，即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三日，我到聊城去面谢他的盛情。此时，范将军刚由茌平旦镇解决汉奸所策动的反动会道门暴动回到聊城。正当我们谈话时，忽然沈鸿烈的参谋长廖安邦由张秋镇打电话来，找范的参谋长王金祥讲话。我们坐在电话机不远的地方，可以清楚地听到廖对王说的话：

“听说范司令要调驻阳谷的二十一支队刘耀亭部去打安乐镇的‘忠孝团’，我看不必要！‘忠孝团’只是些无知的愚民。请你转告范司令，他的‘良心抗战’是人所共知的！只要他能亲自去对他们讲一次话，他们还是会拥护他的……。”

范将军告诉我，这件事他在旦镇时王金祥已经用电话告诉他了。但他绝没想到，这就是沈鸿烈等人布置下杀害他的圈套。范将军当即在电话旁作出决定：

“好吧！我明天就去对他们讲话。告诉刘大队长，不要去打他们啦！”

我问范将军：“既然说是些愚民，却又让你去开导他们，这是怎么回事呢？”范将军说：“他们拿着红缨枪聚众抗捐，还收缴地方团队的枪枝，可能有其他政治背景。”

这时，前方又来了电话，说日军大部队自济南出发直奔聊城，其先头部队已到东阿黄河渡口，在艾山、滑口、姜沟、鱼山一带架设浮桥，估计明天可能到聊城。我又问范将军：

“既然敌人来犯，你明天还去阳谷吗？”他说：“不能去啦，我要集中部队准备作战。‘忠孝团’事件没有解决，也是个麻烦事！”我出于良心和朋友道义，便对他说：“我替你走一趟，开导开导他们。你可以放心布置军事行动。”他问我：“你几时去呢？开导他们的目的，主要是晓以大义，叫他们别妨碍我们对日寇作战。”我说：“我明天天明就走！”他对我此行十分感激，亲切地和我握手告别，还说：“回来再见！”我哪能想到从此再也不能见面了。

后来我才知道，当廖安邦来电话时，他们早已安排下新式的“鸿门宴”，企图假手阳谷“忠孝团”的暴众，在混乱中杀死范将军。

十一月十四日清晨，我带了几个卫兵由聊城骑自行车出发。在将要到达安乐镇时，在王庄村外遇到了三个手执红缨枪放哨的“忠孝团”团丁。老远就大声问：“干什么的？”我回答说：“找‘忠孝团’团长有事！”一个团丁说：“我们团长就住在这个庄上，他已经带着人出发啦，可能正在前边庄上哩。”

我托他们给团长带个口信，说有人来找，如果今天见不到，明天再来见他。说完，我们便骑车继续向前走。

我们走进安乐镇大街时，正遇到那里的省立第一联合中学因日寇进犯而紧急疏散学生。我一走进区公所，立即向张秋镇打电话问那里的情况。

廖安邦知道我到达了安乐镇，立即打电话来，叫我在镇上等他。我告诉他还没跟“忠孝团”接上头，怕发生误会。我又问他：“你是坐汽车来吗？”他回答：“是的，由张秋镇到安乐镇三十华里，二十分钟就可以到达。”

也不知道他安下甚么鬼计策，我在镇上等了近两个小时，还不见他的人影。忽然，区部的岗哨来报告说：“疯狗来啦！”说话之间外面枪声大作，跟着一片杀声震天，一些装束奇异的“忠孝团”团丁，大声喧哗着蜂涌而来。区丁们都向院外跑去，我们几个人只得往后院里躲避。团丁们又追到后院来。一进门就有人用红缨枪把我的副官高铁乔扎倒。我们登着梯子爬上屋顶，还没有站稳脚跟，他们就向房上开枪了。这时，外边的“忠孝团”已把区公所团团围住，院里也站满了人。我站在房子上把自己的名片撒到院子里，意在让他们知道我是谁。团丁多半不识字，虽然院里落满了名片，也没有人拾起来看看，只是大声叫喊：“缴枪！”并有人朝房

上开枪，我在房顶上喊：“我是韩多峰！我是韩多峰！我是来救你们的，为什么乱放枪呢？”

我正大声呐喊时，一颗子弹穿过我的左肩，鲜血立即流出，我几乎跌下房顶。我的卫兵都带着手枪、手榴弹和手提式冲锋枪，他们要还击。我坚决制止他们，并说：“这些人不知道我是谁，也不知道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因而发生误会。倘若还击，局面越发不可收拾了。”

我捂着伤口由房上下来，立即有七八个手执红缨枪的人冲过来把我围在中间，有个人拿着丈把长的长矛对准我的胸膛，我声色俱厉地高喊：“我是韩多峰，是来救你们的。我已经受了伤，你们还想干什么？”真奇怪，他们竟把红缨枪都抽回去了，并让出一条路来让我走向后院。走着走着，又有人拉我。我大声喊：“你们不认识我韩多峰吗？”前院有个人，听了我的喊声大为愕然，走来仔细看过我以后，便大声叫道：“你不是我的老连长吗？我是李广德。”并连连赔礼道歉。原来他是我二十年前当连长时的一个部下。他见我的伤势很重，便找来一把椅子让我坐下，又转身去找他们的团长。

不一会，“忠孝团”首领赵二虎手执黄旗走进来。看见我就把旗子往地上一摔，跺着脚说：“真糟糕，怎么把你老人家伤着了，我们还正打算拥护你出来呢！”我问他：“你们是来干什么的？”他回答说：“是来打范筑先的！”我又问：“为什么要打范筑先呢？”他说：“沈主席说啦，除了国税之外，一概不准附加款项。范筑先叫我们每亩地加一角钱，有的地方两角。我们要抗粮抗捐，因此，才来打他！”

我一听这些话，就知道是沈鸿烈的阴谋诡计！我说：

“也许沈主席有他自己的看法，可是范司令现在正在打日本鬼子，他有三十六个支队，几万人马，吃饭穿衣怎么解决呢？只好加收一点捐税。”

这时，团丁越聚越多。我左肩伤口流出的血已经浸透了棉衣，但我顾不上这些，抓紧时机启发他们：“你们这个团叫什么名字？”“叫‘忠孝团’”。我乘机大声反问：“日本鬼子正在攻打范筑先，你们也要打范筑先，你们想想，这到底忠于谁呢？我看你们不是‘忠孝团’，而是个实实在在的不忠不孝之团！”他们彼此面面相觑，有些人已经为我的话语所打动，那股邪气渐渐消失了。有人沮丧地问赵二虎，“团长，到底怎么办呢？”赵二虎至此也无话可说了。

我又提醒他们说：“目前，日本鬼子正在攻打聊城，这是你们报国的好机会！如果能去抄敌人的后路，帮助范司令打鬼子，得了枪枝子弹全归你们留用；每亩地一角钱的事，我可以保证给你们免除。你们能这样做，才真是‘忠孝团’啊！”

满院的人都哑口无声，此时我却因为失血过多而昏过去了……。

当我苏醒过来的时候，我的侄儿韩进善正在我的身旁哭泣着。有人说：“过来啦！过来啦！”我此时躺在一块门板上，上面铺了一层麦秸，衣服里渗出来的血已经把麦秸染红了。

卫兵把我和副官高铁乔送到安乐镇的一家西药房里去。高铁乔身上有七处伤口，伤势甚重。医生给我们敷药时，廖安邦才慢腾腾地坐着汽车到了安乐镇。那时，我不知道他就是害我的幕后策划者。

他见我伤势很重，就一声不响地溜掉了。聊城沦陷后，他把范死我伤的情况向沈鸿烈报告，沈回电时竟说：“幸甚！”

幸甚！”

我在安乐镇负伤的第二天(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是日本鬼子进攻聊城最激烈的一天。在五十里外的阳谷境内也可以隐隐约约地听到炮声。十六日，炮声听不到了，我估计聊城一定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被送到阳谷城北五十里外的坡里天主教会医院治疗。经过检查，知道左肩骨已经被打碎了。又因失血过多，命在旦夕。卫兵们虽然知道了范筑先将军殉国的噩耗，但怕我闻悉痛哭，增加创伤疼痛，一直没告诉我。不久，我终于知道了我所敬爱的范大哥英勇牺牲的消息，便放声痛哭，哀悼这位伟大的爱国者。

在坡里住了几天，听说敌人已开始四处搜索，不得不转移到我的故乡——东平湖上的渔村去养伤。因为乡村医疗条件差，致成残废之躯。四十四年来，每逢阴天下雨，我的伤口就疼痛，每当此时我就对沈鸿烈等国民党顽固派恨恨不已。

# 卡尔逊临清之行

刘 凤 梧

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美国朋友伊万斯·福代斯·卡尔逊①由“延安文艺工作组”的刘白羽、欧阳山尊、金肇野、林山、汪洋等陪同，在临清工作、生活了五天。

卡尔逊在临清逗留时间虽短，却受到了临清人民的盛情款待。这对加深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起到一定的作用。

## 一、卡尔逊来临清的缘由

一九三八年，卡尔逊在上海作为美国使馆的作战和情报官员，每周一次到《密勒斯评论报》编辑部找埃德加·斯诺先生交换消息。为了解共产党和八路军敌后抗日斗争情况，斯诺先生鼓励卡尔逊亲自到敌后抗日根据地访问，并就此事通过电台询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得到的答复是：卡尔逊赴延安将受到欢迎。于是，卡尔逊赴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会见周恩来同志，在周恩来同志帮助下，偷越日军防线，安全抵达延安。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同志指示刘白羽、欧阳山尊、金肇野、林山、汪洋等五位青年组成“延安文艺工作组”，陪同卡尔逊赴包括临清在内的各抗日根据地访问。毛泽东同志还亲笔给八路军各级领导人写了一封信，请他们对卡尔逊



先生的访问予以关照。

## 二、来临清路上

卡尔逊、刘白羽一行于一九三八年五月从延安出发，七月十六日九时到达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驻地——河北南宫县城，住在一家烟草公司里。七月十七日，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同志会见了卡尔逊先生，副师长徐向前、副政委宋任穷分别同卡尔逊先生举行了会谈。七月十九日晨，驻扎在临清的八路军东进纵队司令部派人专程去南宫迎接卡尔逊等人。七月二十日清晨，卡尔逊一行起身奔赴临清，邓小平、徐向前、宋任穷等为卡尔逊一行送行。

## 三、临清军民热烈欢迎卡尔逊

七月二十日下午一时，当卡尔逊等人离临清城约有两公里时，八路军东进纵队参谋长和七六九团团长孔庆德等便率领一队骑兵前来迎接。船过卫河，卡尔逊便受到了八路军战士、国民党山东省府秘书长雷法章，国民党山东第四专署专员韩多峰以及国民党官兵的热烈欢迎。这些欢迎的人群，几乎把卡尔逊包围起来，他向前走需靠警卫人员在人海中挤出一条通道。从城市入口处到他下榻的华美医院（现聊专二院）短短几百米的路程，整整走了一个多小时。

七月二十一日，临清各界群众几千人在进德会广场（现大众公园广场）隆重集会，热烈欢迎卡尔逊。上午七点半钟卡尔逊在雷法章、刘白羽、欧阳山尊等人的陪同下，登上大会主席台。在主席台上就座的还有沈鸿烈<sup>②</sup>、韩多峰以及国共两党、各民众团体的代表。

欢迎大会按照国民党的传统开会方式进行。先宣读孙中山遗嘱，接着与会者向悬挂在主席台上方的孙中山遗像三鞠躬，然后儿童救国团、妇女救国会等民众抗日团体的代表致欢迎词。会上，卡尔逊阐述了美国的对外政策（由欧阳山尊担任翻译）。沈鸿烈和韩多峰都讲了话。大会在唱国歌中结束了。

#### 四、会见沈鸿烈

七月二十日，卡尔逊等人在美国人开办的华美医院里吃过午饭，在雷法章和孔庆德的陪同下，对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进行了一次礼节性拜访。沈鸿烈用米酒和雪茄招待了美国客人，介绍了山东抗战形势。七月二十一日中午，卡尔逊等人出席了沈鸿烈举办的欢迎宴会。晚上，卡尔逊等人参加了在慕善戏院（现临清剧院）举办的游艺会。会上，八路军前线剧社、战委会以及国民党保安队剧社，都为美国朋友表演了精彩的节目。

#### 五、在临清的其他活动

七月二十二日上午九时，卡尔逊在欧阳山尊的陪同下到八路军七六九团团部座谈。中午，卡尔逊和沈鸿烈等参加了韩多峰举办的欢迎宴会。晚上赴华美医院观看被日寇破坏的地方。日军和汉奸队伍曾化装成土匪，将美国人开办的华美医院的财物洗劫一空，并撕毁了悬挂在医院门口的美国国旗。这些都给了卡尔逊深深的刺激。晚饭后，韩多峰、孔庆德到卡尔逊房中谈至深夜十二点才走。

七月二十三日中午，卡尔逊一行到八路军七六九团团部

赴宴；沈鸿烈、雷法章等人作陪。宴会是在十分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宴会后，卡尔逊与韩多峰在七六九团团部谈话。晚上，卡尔逊邀请沈鸿烈来寓所谈八路军的政治纲领至深夜。这次谈话，事先征得了孔庆德团长的同意，有助于统一战线巩固。

七月二十四日，卡尔逊到华美医院治疗回归热病。当时，这所医院的外国大夫都离开了，由一位中国男护士主持工作。卡尔逊开始不敢相信他能给治好病。结果，只给他打了一针“六〇六”，六个小时后，烧就退了。对于一个工作在小城市里的中国护士，能有如此负责的工作态度和精湛的医疗技术，卡尔逊非常敬佩。当天下午，卡尔逊在欧阳山尊的陪同下到沈鸿烈、韩多峰、孔庆德处辞行。

七月二十五日，卡尔逊一行在军队和民众的欢送下离开了临清。卡尔逊临清之行，使他了解到临清人民抗日的决心，使他对国共两党有了深刻了解，同时使他感受到临清人民对他的深情厚意，对中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增进中美人民友谊起到一定作用。

注：

①伊万斯·福代斯·卡尔逊，一八九六年二月二十六日生于美国纽约州息尼市的一个牧师家庭。一九一二年应征入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在西线的野炮部队作战，后退役。一九二二年，又入海军陆战队服役。一九三八年，他作为观察员和情报官员，在刘白羽等人的陪同下，巡行了包括临清在内的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他后来撰写的《中国的双星》对此行有详细记载。美国对日宣战后，卡尔逊根据八路军的经验，征集坚决抗日和富有民主精神的美国青年，组织了

一个突击营。一九四二年八月，该营在大洋洲的吉尔伯特群岛发动了四十个小时的辉煌袭击；十一月，该营在瓜达卡纳尔岛登陆战中担任前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支精锐部队很快便以“卡尔逊突击队”闻名了。一九四四年，卡尔逊在塞班岛受伤后回到美国。一九四五年，他荣获军功勋章。一九四六年因伤退役，当时军衔为准将。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卡尔逊逝世于俄勒冈州胡德山（波特兰城）。

②沈鸿烈，湖北天门县人。早年被清朝湖广总督张之洞派往日本学习海军，后任张作霖的东北江海防副总司令。国民党时期，历任青岛市市长，山东省主席，农林部部长，浙江省主席等职。

# 反税监斗争与王朝佐

祁长安

明朝万历二十七年（公元一五九九年），临清爆发了震动京畿的市民反税监马堂的斗争。这次斗争是明代全国各地人民反矿监、税使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王朝佐就是在反税监斗争中为手工业工人而牺牲的一位烈士。

临清在明代中期已发展成为运河沿岸的重要商埠之一，南北货运船只云集于此。城区日趋繁荣，绸缎店三十二座、布店七十三座，棉花店、粮店、杂货店、茶店、药铺也有许多处。手工业作坊有了很大的发展，纺织、木器、竹器及窑业等行业尤为突出。王朝佐就是编制筐篓的工匠。

明代中期以后，封建统治日趋腐朽，土地兼并激烈，赋役剥削加重。残酷的封建剥削，致使大量农民破产，朝廷入不敷出。为增加财政收入，明政府加强了对工商业的税收。

明宣德四年（公元一四二九年），临清设“钞关”，“督收船料商税”。明政府在临清所得“关钞”“大约岁至四万金”。

明神宗朱翊钧是个贪婪、荒淫的暴君。曾派出大批宦官到各地充任矿监税使，以增加朝廷收入为名，敲诈勒索，掠取大量金银财物。派到临清来的就是督税天津、兼管临清税务的宦官马堂。

税监马堂是个残暴阴险、贪婪成性的宦官。他一到临清，便在城区和水陆要道设立重重税卡，建立衙署。网罗地痞、流氓、恶棍等“亡命之徒数百人，手拿银铛、横行街衢”，公开抢夺工商业者的财物，拦截过往船只，任意要税，谁若稍有意慢，就诬之为“违禁”，货物被抢，甚至横遭捆绑殴打。工商业遭到严重摧残，绸缎店、布店、杂货店相继倒闭过半，“中人家破者大半”。山西、陕西、安徽等地商贾纷纷撤走，手工业日趋破产，一座繁华的工商业城市，当时呈现一幅衰败景象。税监马堂却依旧恣意妄为，甚至随意杀人，市民忍无可忍，遂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一五九九年）四月爆发了由商人、作坊主、工匠、徒工参加的反税监马堂的斗争。

四月的一天，市民万余将马堂的署衙团团围住，要马堂免去重税。马堂不但不应，竟“令弁随从署内往外发矢”，当场“射杀二人”，众随大哗，攻入署内，“杀死弁随三十七人”，“火烧其署”，“堂窘，赖王炆救之得免”。在这次斗争中活捉马堂爪牙甚多，游街示众，大快人心。

临清市民反税监斗争震动了朝廷，大学士赵志皋奏本说：“昨日山东抚臣揭谓众怒为水火不可响迳，若不及今取回马堂以安反侧，则将来事势有不可忍言者。夫矿税之役，臣亦逆知必然有今日……然不意临清一发若斯之烈也。临清为运河咽喉，齐鲁要塞，民俗剽悍，加之东西南北之人贸易辐辏，乘乱一呼，云集雾合，此地一摇，则三齐震动，京师欲安枕不可得矣。乞速下德音，急撤回马堂，行令抚按，加意安抚，或念法不可绝，姑就一二倡乱者惩罚，以弭观望，实宗社无疆之福。”神宗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令巡抚刘易从去临清

“查为倡乱者”。

刘易从奉旨到临清后，诏捕首恶“株连甚众”，“众多逃亡”。在临清市民大难临头的关键时刻，王朝佐大义凛然，挺然而出，“愤曰：‘首难者我也，请独当之，勿累无辜’”至是抚臣刘易从以“首恶王朝佐一人抵罪，命即梟首彼处，以儆众心。亦不复问余党也”。王朝佐仗义“轻生”，临刑时引颈受刀神色不变，从容就义，“株连者俱得免”。

王朝佐为了保护群众，从容就义，表现了一个手工业工匠无私无畏的高贵品质。他是在反税监斗争中涌现出的一位杰出英雄。他牺牲了，他的英雄事迹在人民中间广泛流传。他就义数年之后，临清人民为了纪念他，于天启年间建立了“王烈士祠”。清道光三十年，市民又为王朝佐立碑以示敬悼。其碑文如下：

### 临清王朝佐烈士碑

王烈士者，明末人也，姓王，讳朝佐，平素仗义。万历年太监用事，中官马 者，收税临清，百端骚扰，地方被害。人心痛恨已极，焚其衙署，毙其党三十七人。事闻株连甚众，人人自危。王朝佐慨然出首，一人承当，阖郡人民赖以保全，载在明志。当时州尊陈一经嘉其义，为之立祠。其祠倒坏三十余载，士民过其地者，知其慷慨殉义之事，莫不歔歔悼叹。今者惟赖四方好义君子，同心捐助，因其旧址，廓而大之，鸠工庀材，不数月工程告竣。庶几微显幽阐，而烈士义气之概，永垂不朽，以符有功德于民，则祀之之意云。

大清道光三十年岁次庚戌仲夏

阖郡士民公立

# 吴秋辉先生评传

刘 又 辛

吴秋辉先生名桂华，字秋辉，自号侏僂生，是二十年代一位卓越的史学家、中国语言文字学家。

秋辉先生一八七六年生于临清考棚街一个手工业者家庭。父名允升，母王氏。幼年天资颖悟，稍识文字，便对文学发生了兴趣，喜欢阅读小说和诗词，十几岁便能写出很不错的诗文，闻名乡里。他不喜欢八股文，十五、六岁时应童子试，没有考上秀才。十八岁因病辍学，在病中习作八股文，次年应试，便进了“学”。但不肯应举人试，却考入了新开设的山东优级师范数理部。

一八九六年前后的中国正处在危急存亡的关头，以变法维新派康有为等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人物，鼓吹用欧洲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改造清朝的腐败政府。各地的新学堂，就是在这种思潮的推动下建立起来的。吴秋辉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便决心放弃科举这条老路子，考入了新式学堂，并且暂时抛弃了他一向喜爱的词赋，改攻数理。

在优级师范，他学自然科学的成绩很好。这期间他还写



了一本《算法易解》，是一本有独创性的讲数学学习方法的通俗著作。优级师范毕业后，他又考取了日本留学生。但在“学司”传见时，见他只有一只眼睛，便以有碍国际观瞻为藉口，取消了他的录取资格。

一九〇〇年他回到临清兴办教育。一九一二年民国成立后，他又到了济南，做一家报纸的主笔。那时因为刚刚推翻了帝制，各种保守反动的政治力量都乘机活动，政治依然腐败如故，秋辉先生发表了许多文章，对时局痛加评论。但辛亥革命并没有使国家富强起来，他看到当时的局面同过去并没有多少改变，于是一股热情顿时冷却下来。他又不甘心同那般随波逐流的人们同流合污，于是转而变为消极颓废。他终日以诗酒度日，有时泛舟大明湖，狂歌豪饮；有时和二三知己评弹时政，恣意笑骂。这些情景都反映在他这时期所作的诗词中。这些诗词，气挟风霜，狂歌长啸，在那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是很有特色的。

从一九一七年起，秋辉先生才把主要精力用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方面。

他研究这一套学问，首先从古文字学入手。在读《楚辞》、《诗经》时，他发现书中有些字讲不通；查检许慎的《说文解字》，有些字的解释也是错的；于是进而研究甲骨文、殷周金器铭文这类古文字，写出文字学的好几种专著。他又进而研究了方言、历史、哲学、易经，都有专门的论述。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七年他因病逝世为止，十年中写成了四十余种著作。下面是经过初步考订的目录：

- 一、《学文溯源》二卷；
- 二、《学文溯源续编》；

- 三、《古今文字正变源流考》二卷；
- 四、《古文字》；
- 五、《齐鲁方言存古》二卷；
- 六、《毛诗正误》四卷；
- 七、《三百篇通义》三十二卷；
- 八、《诗经名物拾义》五卷；
- 九、《三百篇古物今考》五卷；
- 十、《说幽》；
- 十一、《诗经解颐录》；
- 十二、《楚辞正误》；
- 十三、《楚辞正误续编》；
- 十四、《古史钩沈》二卷；
- 十五、《左传正杜》一卷；
- 十六、《姓氏名字号谥源流考》；
- 十七、《五霸考》；
- 十八、《秦建国考》；
- 十九、《货币源流考》；
- 二十、《商代迁都始末考》；
- 二十一、《中国石刻考》；
- 二十二、《杂考》；
- 二十三、《古史考源》；
- 二十四、《周武王考（周公封于鲁考）》；
- 二十五、《说经》；
- 二十六、《说易》；
- 二十七、《八卦分宫正谬》一卷；
- 二十八、《周易考略》；

- 二十九、《论语发微》；
- 三十、《仪礼今古文考异》；
- 三十一、《檀弓纠谬》一卷；
- 三十二、《礼记正误》；
- 三十三、《学海绀珠》三十二卷；
- 三十四、《渔古碎金》二卷；
- 三十五、《侘祭集》（诗）
- 三十六、《寄傲轩吟稿》（诗）
- 三十七、《侘祭轩诗剩》；
- 三十八、《侘祭轩诗余》；
- 三十九、《侘祭轩词余》；
- 四十、《艺苑撷华》；
- 四十一、《艺苑杂抄》；
- 四十二、《东楼琐录》；
- 四十三、《破屋宾谈》。

这些著作目录只是现在所能考见的吴老著作中的一部分。事实上他的著述远不止这一些。有些著作没有写出定稿，有的已经散失，只留下目录。

这些著作又是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写成的。他在这十年中，生活上极为困难。他不肯随便找个职业谋生。那时他有这一套学问到大学去任教满能胜任的，可是他因为性格孤傲，自己的学术主张同当时的名流学者又大不相同，也因为他一向养成白天睡眠，通宵读书的习惯，不便任教，所以谢绝了清华研究院和北京大学的聘请，住在济南榜棚街九号一座破旧的小楼里，独自探索中国古代文化这个极为复杂的课题。

一九二七年五月，他得了感冒，但因为缺医少药，病情

恶化，在这月二十日便与世长辞。他年仅五十一岁（按照过去的说法是五十二岁）。

秋辉先生对我国古代文化研究的成果，至今还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有些精辟的见解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下面只举两个例子。

拿他研究古文字来说吧。在他那个时代，一般研究文字学的人，都跳不出许慎《说文》的圈子，连当时闻名国内外的大文字学家章太炎也不例外。那时研究甲骨文字、殷周金器铭文等古文字的人，只有罗振玉、王国维等二三人，而且出版的拓片和著作也不多。秋辉先生从阅读先秦古籍中认识到，要读懂古书必须懂得文字学，而要弄懂文字，又必须从古文字的研究入手。他以一个穷书生，要想弄懂这门学问可不容易。他跑南跑北，跑旧书店，跑古董铺，跑世家大宅，靠着他的毅力和超越常人的记忆力，竟然只用了五年左右的时间，搞通了这一门学问。他写出的《学文溯源》一书，传到梁启超手里，认为是“字字莫逆于心，欢喜踊跃，得未曾有。”这部书大约是一九二三年写成，第二年梁氏看到的。那时梁氏正和王国维一起在清华研究院做导师，王国维是当时研究古文字和治史的独一无二的大师，王氏关于古文字的论著梁氏当然全知道，他见到吴秋辉的《学文溯源》，评价竟如此之高，感受如此之深，可见在梁氏心目中，这位作者在这方面的成就的确是惊人的。

秋辉先生用文字学的眼光研究《诗经》，有很多极精辟的新见解。如《诗经》第一篇第一句“关关雎鸠”的“雎鸠”究竟是什么鸟？过去从来没有人考证出来。旧注只说是水鸟。但水鸟的种类很多，究竟是什么水鸟，连清代的乾嘉大师们都没有考订出来。秋辉先生利用古文字学的知识，断定这雎

鳩就是大雁。“睢”本来只写做“且”，“且”有大义，“且鳩”即大的水鸟，雁是水鸟中最大的，所以“睢鳩”即大雁。大雁有一种特性，雌雄结成对以后便永不分离，所以用以和淑女、君子的结为伴侣相比。这个考证精辟极了，可以说是个定论。在文献上和民俗学上我给这条考证增加了两条旁证。《仪礼·士昏礼》说：“昏礼，下达纳采，用雁。”这可证明用大雁当做举行婚礼时的礼品本是古代曾经通行的礼节。另外，解放前举行婚礼时，男方亲迎要带上一只雄鸡，女方要带一只母鸡，婚礼后这两只鸡在男家一块喂养。这大概是因为雁不易得到，而又要保存古礼，便只好用鸡来代替。《关雎》这首诗本是古代的婚歌，用大雁来象征新婚夫妻坚贞不二、白头偕老，可以跟《仪礼》和民间风俗相印证。

象这类的考证，都收在他的《三百篇古物今考》等书中。

他对《诗经》曾做过全面的研究，关于孔子删诗的问题，关于风、雅、颂的名称，关于赋、比、兴的解释，关于国风的地理分布，他都有许多独到的见解。

他对《易经》也有很精辟的看法。他认为，《易经》本是古代算卦的书，后来经过若干年的变化附益，才变成一部既象占卜又象哲学著作的书。他说，最初的占卜大概只有阴阳两种符号：阳画做“—”，阴画做“--”。这好比一个铜元，有正反两面；正面是阳，反面是阴；用以决定输赢或决疑；也就是拈阄。后来由于这两个符号的重叠、再重叠，于是由“两仪”而成为“四象”，又由“四象”而成“八卦”；八卦各自重叠，就成为六十四卦。后来由占卜而发展为与人事、政治相关，于是增加了哲学色彩而发展出“十翼”。他对《易经》的这种解释，拨开了两千多年来蒙在这部书上的神秘

云雾，实际上是从人类社会学和民俗学的角度分析《易经》的发展过程，这种方法是跟今天我们经常强调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很相符合的。

总之，秋辉先生对我国古代文化的研究是很有识见的。他的许多见解在当时曾引起比较大的影响。这可以拿几件事来说明。

一是山东名状元王寿彭，曾奉军阀张宗昌之命在济南筹办大学，聘请了一些京沪国学界名流充当教授。秋辉先生便在报上写文章，大谈大学中文系应该开哪些课，哪门课应该怎么讲，讲哪些内容，搞得那些名流学者局促不安。王状元只好连夜去拜访他，请他笔下留情，并请他到校任教授，可以不去授课，坐领干薪。秋辉先生大怒，表示写那篇文章的目的，一是为山东学子请命，二是向那些名流请教，并无他意。

二是他和康有为的一场“笔墨官司”。秋辉先生遗稿中有他和康有为讨论《尚书》真伪的三封信，两封是写给康氏的，一封是康氏的覆信。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一书，本是用经今文家的家法为其维新变法服务的一部书，单从学术观点上说，漏洞甚多；但他给秋辉先生的信中，却含有以长辈教训后生的口吻，这就激怒了他，便在最后一信中广征博引，把康氏驳得体无完肤，再不敢回信。另一回，是康有为到济南讲学，题目是根据《礼运》讲他的“小康”、“大同”一套主张。那篇讲演在报上刊载后，秋辉立即为文批评，经过反复交锋，也是南海败北。这两件事可能是在同一时期发生的。

三是他和梁启超的信件往还。这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

一件重要的事，需要详加叙述。

时间大约是一九二五年十月间，秋辉先生在栾调甫、张默生的怂恿下，给梁启超写了一封信，叙述他治学的经过、著述的篇目和对中国文化的看法；希望梁氏能帮他出版他的著作。梁氏在几年前曾见到过《学文溯源》这本书，对秋辉先生已很景仰，接信后立即写了回信。这封信的内容如下：

秋辉先生著席：奉书欣若晤对。先生以为启超不知并世有先生其人，岂知我之于先生心藏心写者两年有余，正恨无以自通于左右也。记甲子（按一九二四年）春夏间，在都中师范大学讲学，有一学生赠我以《学文溯源》一册，归而读之，字字莫逆于心，欢喜踊跃，得未曾有。正思追访道踪，一致拳拳；时正值亡妻病亟，心绪不宁；未几遭丧，家室抢攘，乃致并此册子而失之。两年来屡欲补购，迄无所得；而赠书之学生亦不复忆其姓氏；惘惘不怡，匪朝伊夕。忽奉大札，媵以鸿著多篇，其为快怵，岂有涯涘！先生识力横绝一世，而所凭借之工具极笃实，二千年学术大革命事业决能成就。启超深信不疑。大著不可不亟谋全部公之天下。若剗削之资一时不给，启超愿全力负荷之。若有钞胥，盼飭录副见寄。若并此无之，望将原稿挂号付邮；当飭缮录后郑重寄复。未成之稿须着手赅续图之；稍有机缘，终须得当以报也。亟思相见，彼此同之。惟启超倾僦居校中，一舍逼仄，无以待宾客。而本校距城数十里，居者相访殊不便。（只许我访人，不许人访我。）本欲借此谢绝尘俗，然苦无以慰欲见君子之调饥矣！且俟暑中休假，或南游以图良晤耳！匆匆布复。直摅怀抱，无复浮词。诸维爱鉴！

启超拜复十月十三日

梁氏在这封信里对秋辉先生评价之高，感情之真挚，至今读了还令人感动。说他的识力“横绝一世”，说他“二千年学术大革命事业决能成就”，“启超深信不疑”。这决不是随便的过誉，而是梁氏对秋辉先生学术成就的正式评价。

可惜秋辉先生一生过分孤高，竟认为给梁氏写信是一种“失节”，信发出后就后悔了，所以接到梁氏这封充满热情的信，竟再也没有写回信，因而失掉了一次刊印全部著作的机会。大概也是梁氏的推荐，清华研究院和北京大学都邀他去任教，也都一一谢绝了。

从上面的几件事可以看出，秋辉先生的学术的确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峰。可惜他的著作大部分没有公布于世，一般人只知道他是个怪人，好骂人，目空一切，对于他的学问，他对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真正价值，知道的人却很少；象梁启超那样慧眼识英雄的一代名流，就更少了。

我们这样评价吴秋辉，也并不是说他的一切说法都是定论，都是无可非议的。一个人总不能脱离他所处的时代，我们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秋辉先生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秋辉先生的治学态度和走的路子，和顾颉刚等人的疑古派有相似的地方，对先秦的典籍否定的多了些，有些论点失之偏激；有些随笔，见地不高；有些考证本是未定稿，还待验证。但大醇小疵，贤者难免，我们不能对他作过分的苛求。

现在我们党和政府正在组织力量整理我国古代典籍，不少专家学者正在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我国古代文化进行全面研究，吸取其精华，使之成为具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组成部分，用以创造我们的高度精神文明；在这时候，我们有责任对秋辉先生的全部遗稿加以整理，使能早日公之于世。

秋辉先生的著作，历经变乱，尤其是在十年动乱期间，许多遗稿都残缺不全了。这些稿件一直保存在我市老教育家张乾一先生手中。张先生是秋辉先生的门婿，他已年过九旬，仍在和他儿子张树材同志辛勤地整理和交涉出版这些遗稿。我们希望这个工作能得到更多的支持。

1985、2、6

于重庆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



# 临清十六景考述

王 洪 辰

临清为一著名古城，名胜很多，有的尚存，有的遗址鲜为人知，故有考述之必要。临清十景首见于清朝乾隆十四年（公元一七四九年）王俊纂《临清州志》。其名是：卫浒烟柳、汶水秋帆、官桥晓月、津楼夜雨、南林双松、东郊春树、土山晚眺、平冈积雪、塔岸闻钟、书院荷香。至民国二十三年（公元一九三四年）张树梅纂《临清县志》时又新增了鳌矶凝秀、凤岭钟英、泥寺春晖、古槐荫井、南亭观化、东郊孤松六景。现分述于后。

## 一 津楼夜雨

津楼夜雨一景是指古楼。古楼曾叫启秀楼，也叫拱极楼。它建在原砖城南门外运河北岸启秀津上。楼两级，高百余尺，为歇山式卷棚顶，飞檐挑角。下有四门，可通车马，北向大街直 南门进城，南靠运河涯，步石级而下可乘舟楫远航。据志书记载，此楼建于明代景泰元年（公元一四五〇年），与建砖城同一时期。嘉靖七年（公元一五二八年）由兵备副使聂珙重修。乾隆三十九年（公元一七七四年）毁于战火。咸丰十一年（公元一八六一年）临清知州陈宽又重修。

过去这里是文人墨客游览之处，同时也是监督船艘出进东水门的指挥所。清代江南太仓人、顺治时进士王揆有《临清阻泊》一诗云：“河渠启闭问官程，闸吏威严阻客行。晓塔晴开蓬外影，夜涛寒上枕边声。”是当时的真实写照。清代宣统元年（公元一九〇九年）优贡、临清人张树梅也以“舟泊汶河岸，人登启秀楼。津关连夜雨，灯火万家秋。落叶随风下，归云绕槛流”之句，来歌咏古楼景色。

一九六六年因地震，此楼倾斜断裂，于次年夏拆毁，物料统归东方红剧院作建筑材料。一九八一年业余文物爱好者殷黎明同志在剧院门口发现埋有明代万历末年临清知州蔡三复重建启秀楼卧碑一通，上刻“启秀津”三字，现嵌于公园大厅基壁之上供游人鉴赏。

## 二 土山晚眺

车营街南首运河东岸有一土岭，南北分若干段，高五、六丈，蜿蜒起伏形若腾龙，故名龙山。旧志土山晚眺一景即指此处。昔日山上遍植杨柳，夏秋间河水涨发，则山水相映，景色诱人，橹声渔歌交响致趣；夕阳西下，登其上，万家灯火，尽收眼底，更是一派大好风光。

据查，龙山乃明代永乐十五年（公元一四一七年）开运河南支时，积河土而成雏形，其后每年一小开挖，隔年一大疏浚，清除头闸口和二闸口之间的淤泥聚集其上，日积月累，土埠渐高，终于形成了鲁西平原上唯一人造土山，成为临清的游览胜地。解放后，人民政府曾将此处命名龙山公园。但近几年运河干涸，船只断航，土山屡被私人或单位侵占，风景大减。

### 三 东郊孤松

砖城东门外二里许，陈坟村东北角有古松一株，高三丈，围长两丈，齐腰处有斑斑突起，状如叠云。树冠形如巨盖，其枝似虬龙盘旋。更奇怪的是叶有五种形状。即米粒、竹篾、针、刺、喇叭形。所以人们称为五样松，实是桧柏之属。炎夏坐其荫下顿觉凉爽。雨季可供人避雨，静听尚有松涛潏潏。

据陈氏后代谈，明代永乐年间其先祖任锦衣卫，先祖母自浙江绍兴府北上时，因怀念故土乡情将五种松树树苗扭成一束插入花盆，随粮船带来临清。成活后，树渐大，遂植于庭院。其先祖母去世后，即移栽于墓旁，以作纪念。日久年深，树自大而人称奇。后人将其列为名胜之一。张树梅赋《东郊孤松》云：“中有长松高百尺，枝柯蜿蜒如龙蛇……菟枯不与凡卉并，郁然直上色参天”，寥寥数语，道出其傲骨之风。

一九四三年树内起火，浓烟自树缝冒出，三日不灭，后用黄泥糊严树缝方熄。但此后数年中，其枝叶较前更加茂密。一九六九年树内又起火，竟历时八十余日，仍以前法制熄。据查，两次着火均系儿童钻入树孔燃火烧食而致。近几年来枝叶日渐稀疏，似有干枯之状。仍然不减当年雄姿，吸引不少游人观赏。

### 四 凤岭钟英

凤岭钟英指的是临清公园内西北角上之黄土高岭。其高

岭的形成与龙山一样，属于开运河南支时积土所致。岭呈南北狭长形，高数丈，沿河堤绵亘里许。昔日岭对岸有“卸货口”码头。景德镇瓷器、苏杭刺绣、蔗糖等均在此上岸，荟成市场。岭下旧有三官庙，规模宏大。清朝康熙帝于一七〇三年来临清时，易其庙名为“无为观”，并濡墨作匾。康熙的孙子乾隆皇帝曾七下江南，路过临清，题榜作联，赋诗泼墨。公元一七六五年他给无为观题“福祐津途”作榜，题“双闸节宣资利济，三元调燮协宁居”作联。一七七〇年南巡时，自无为观下船乘马由岭上而过，至头闸门下鸡嘴坝复登舟而去。事后，当地文人借此为临清溢美，将此岭命名“凤凰岭”。张树梅纂《临清县志》时，以“凤岭钟英”载入史册。乾隆三十九年（公元一七七四年），乾隆四十一年（公元一七七六年）先后撰书《临清叹》、《临清歌》长文两篇，刻石立于岭下。文中对镇压王伦起义军的清兵将士大肆炫耀，而对农民起义将士则极力污蔑和诋毁。

民国二十一年（公元一九三二年）于岭南设体育场，翌年于岭下建进德分会（韩复榘倡办为士绅聚会之所），建五楹二十四柱，歇山式飞檐大厅一座，移鳌头矶前之木牌坊立于对面，使凤凰岭下颇饶古致。新中国建立后，此地辟为人民公园，引南竹雪松、幽兰扶桑植其内，饲养着鹿驼熊狼，繁殖些名鸟珍禽，使园林气氛浓厚，景致亦日臻秀丽。一九八〇年前后，文物工作者相继征集到唐代大理石佛像，吴道子画关羽像石刻，明代王朝佐烈士碑，清代大书法家翁方纲摹米芾书“宝藏”碑及明清墓志铭数十合，均置于显豁处，供人鉴赏。目前这里已是春来桃红柳绿，鸟语花香；冬至仍见竹林青青，松柏森森。真是园林风貌，日新月异，游人如

织，乐道津津。不愧凤岭钟英之佳誉了。

## 五 塔岸闻钟

土城北门外三里许卫河套内，有九级八面砖塔，高六十余米，其顶形如将军盔，威武壮观。整个基座为条石叠砌，高五点三米，周长三十九米，塔身为砖石木混合结构。门向南开，内有壁道盘旋可上。两层以上八方设门，四明四暗对称美观。每层密檐宽度为一点五米，下有陶质斗拱及莲花承托。原来各角都有雕刻横木伸斗，所系铜铃常在微风中飘动，叮咚作响，声震原野，故人赞曰“塔岸闻钟”。塔内造象多尊，且有《修观世音菩萨宝塔疏》和建塔《募化方》，记载着建塔始末。更有“东兴泰岳”、“西引太行”和“秀聚中天”石额以显宝塔之峻美。清代顺治年间，有荷兰人仰慕此塔建筑之精巧雄伟，曾莅临摹图绘影而去。

一九八一年版《中国名胜辞典》以“临清砖塔”列条纳入，并称“省内仅见”。次年秋，古建筑学家路炳杰曾莅临测绘拍照。他鉴定后认为塔中心有通天木柱，即唐代营造方式，又言及此塔顶用油灰拌纸浆凝而成，此说更值得加以研究。

塔后原有永寿寺，规模显巨，殿宇恢宏。僧众同寂（去世）之后，其骨灰按身份予以安妥。故有墓塔林之称。此塔高耸入云，定是主持僧骨灰贮藏之所。但亦有传言其内藏有如来佛之舍利子者，实是附会，不可轻信。

据志书记载，此塔建于明朝万历四十一年（公元一六一三年），由万历丙戌科进士、工部尚书、临清人柳佐监

修，历九年乃成。底层门楣石额现有“舍利宝塔”四字，由万历己丑科进士、山西按察使、临清人王成德书款为证。

宝塔迄今已近四百年历史，而仍巍然屹立，可见传统技艺之高，对现代建筑大有借鉴之益。

## 六 鳌矶凝秀

鳌矶凝秀一景是指现在临清剧院东侧鳌头矶建筑群而言。明代永乐十五年（公元一四一七年），开运河南支时，北支遂废，在两河分叉之处砌以石坝防止冲刷。其坝形如鳌头，原北河上的临清闸（在入卫口处今无存），会通闸（即现在后铺桥址）和南河上的头闸、二闸列其左右为四个鳌足，而广积桥（指卫河上的浮桥，今先锋桥南）拖后，权作鳌尾，致成全鳌概念。明代正德年间，知州马纶因见石坝系鳌形，故题名“鳌头矶”。

现存的鳌头矶建筑群东楼名观音阁，南楼名登瀛楼（俗称望河楼），西殿是吕祖堂，北殿叫甘棠祠，（俗称李公祠，李公指清代道光年间知州李天锡），整个院落结构严谨，布局得体，玲珑纤巧，幽静肃穆，是人民畅游之地，故有鳌矶凝秀之称。明清两代漕运鼎盛，每逢秋季登其上凭栏眺望，可见粮艘麇集，帆樯如林，碧波荡漾，景色绮丽。无怪明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赋七绝两首抒其感受：“十里人家两岸分，层楼高栋入青云。官船贾舶纷纷过，击鼓鸣锣处处闻”；“折岸惊流此地回，涛声日夜响春雷。城中烟火千家集，江上帆樯万斛来”。真是寥寥数语，描述得淋漓尽致！明代著明诗人、后七子之领袖、临清人谢茂秦借景抒情衷告友人：“搗赋三秋堪寄兴，定交千里见知音。庙廊自合经纶远，冠冕谁当雨露深。”此诗更以“鳌



头矶下征帆发”为首句，其寓意更加深奥。

这里不仅是文人聚会之所，而且是革命者的活动中心。我地下党员丁浩川、李葵元、黑若仙、秦和珍、王笑一、姜辅宸等曾借此地创《力报》社，建战委会，宣传抗日，传播马列，

一九七八年此地列为地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名胜一九八一年收入《中国名胜辞典》。近几年来，著名书画家李苦禅、蒋维松、高启云、李予昂、黑伯龙、弭菊田、张彦青等先后为其题画留念。山东省文联秘书长夏雨常赋五律一首表示感叹。“欣喜站鳌头，赤子乐悠悠。心欲当年景，诗怀脉脉酬。仰瞻紫燕舞，俯瞰绿波流。云从水中生，我自天空游”可谓佳作，由著名书法家魏启后手书以赠。如此累累宝藏，使鳌矶凝秀更凝秀，独占更上一层楼。

## 七 古槐荫井

经查访，砖城东门外，林园村东北角上，原张树梅家打谷场边有古槐一株，干高八尺，围长两丈，虬枝蜿蜒，叶遮碧空。荫下有水井，树影倒映水面，别有奇致。故曰“古槐荫井”。公元一九五九年前后连续遭到雷击，树渐枯。而今水井尚存，但古槐绝迹。幸其后裔张旭之应诺另植幼槐一株，俟传胜誉。

## 八 南亭观化

运河头闸口北，东夹道街南首偏东，古有大王庙，庙内因开挖运河积土而成埠，高十余丈，方百余步。清朝道光年间于其巅建八角亭一座，名“观化亭”，遂有南亭观化之

说。民国十八年（公元一九二九年）此亭被拆，土埠夷为平地，现辟为民宅。

## 九 卫浒烟柳

查乾隆五十年（公元一七八五年），张度纂《临清直隶州志》城区图，原避雨亭西南侧，今先锋大桥西南约二里许河套内，有半月形柳行，隐约可见烟柳景象。又查公元一九三四年版《临清县志》，载有张树梅《游柳树园》诗。其中有“卫浒秋深万木凋，柳园景物倍萧条。……浊浪拍天云似幕，回风撼树叶如潮”之句，描绘出当年河坡柳树生长之繁茂，“卫浒烟柳”即指此地。

## 十 书院荷香

明清两代实行科举制，以孔庙为学宫，此外另设书院共同育士抡才。临清“清源书院”建于明代嘉靖十一年（公元一五三二年）。清乾隆二十年（公元一七五五年）由知州马瑛重修。乾隆三十九年（公元一七七四年）毁于战火。乾隆四十一年（公元一七七六年）临清升直隶州，在工部营缮司旧址创建考棚（今市第三中学），其东改建书院。于院中掘池栽莲影喻君子廉洁（谐音莲节）习为常事。“书院荷香”指此较可信。

## 十一 泥寺春暉

位于北门里（卫河东）即今热业公司驻地，原有古刹。传为元时建，名弥陀寺，俗称泥陀寺或驴驮寺。据查，明代礼部尚书、武进士胡濙撰有“敕赐净宁寺碑记”，即指此寺。

文中记有“奉钦依准遵盖殿廊瓦、山门、方丈、伽蓝、祖师厨库、僧房，装塑诸佛像，幡花供具……兹寺乃西天佛子大国师法子重新盖造，又蒙敕赐名”等等。至今，当地人常讲“泥陀寺的佛一千多，一个罗一个，跟活的差不多”。其泥塑栩栩如生，甲于齐鲁。《临清县志》宗教类十九页标明泥寺春晖即此。

## 十二 南林双桧

《临清县志》记载：“土城景岱门外（今东风办事处皮袖厂驻地），清凉寺内有桧楸二株”。又在寺庙类，表二中，特别注明此树传系汉时植，旧志所称南林双桧即此，今无存，寺已毁。其碑移大佛寺（今市卫生防疫站驻地）。临清人田雯有诗云：“清凉破寺古佛国，中有双桧幽可探。”清平王贵笙《天宁寺双槐双柏歌》中有“城南有寺曰天宁，殿后双柏何青青……。南林桧后此继起……”之句。从二诗所述足可证明天宁寺双柏与清凉寺双桧绝非一体。但当地流传甚广的是南林双桧就是天宁寺双柏。谈的人更是绘声绘色，津津有味。因此终作考述以正道听途说。

## 十三 官桥晓月

古时卫河上无桥，跨河只靠船只故称津渡。临清城区卫河之上著名渡口有七，而广积桥渡（即浮桥）最大。《临清县志》交通类桥梁表中记有“浮桥为临西来城之要津，明弘治时副使陈騭创建。万历时于西岸凿石为纤道。清顺治时州人李际泰募资造舟十二只，又于东岸叠石廿余级。昔日所称官

桥晓月即此。乾隆时毁于兵燹”。又云：“广积桥即浮桥口”，据当地群众指点，自竹竿巷西行可直达浮桥口。

## 十四 汶水秋帆

鳌头矾前运河之名有四。①会通河。元朝翰林学士杨文郁在《会通河记》中说：“……明诏翰林院，其为运河命名，且文其碑，臣等乞赐名会通，……”由此证明“会通河”之名是皇帝批准的。②汶水。因运河源出于泰安仙台岭，抵徂徕山南与小汶河相汇，经汶上跨南旺湖而北流，故名汶水。③闸河。因自南旺湖北流穿过黄河后，地势渐洼至临清降九十尺，必建闸节水。这一段共有闸十七个，故名闸河。④运河。元明两代建都北京，宫俸兵饷盖由南方供给。因而开河济运，故称运河。近来查阅文献，访诸老人，得知往昔每年秋季南粮北调，自三里铺至头闸口，其间停船一百二十八个船队，帆樯林立，昼夜装卸，数月不败。汶水秋帆当指此景。清朝光绪二十七年（公元一九〇一年）津浦线通车，漕运停止，此景大煞。

## 十五 东郊春树

东郊春树一景见于王俊旧志。其中“春”字应比喻生机勃勃，欣欣向荣之意，也可视谓妙龄青春。公元一九三四年版《临清县志》对此景未作交代，却增有东郊孤松一条。这是个疑问。初步设想是否张树梅等纂写县志时考虑到，再沿用旧名已不切合实际，而易名东郊孤松更为明确呢？这样做会使字异音同，容易混淆的“春”“椿”不致误解，以免谬传。这仅是推断

而已，有待识者矫正。

## 十六 平冈积雪

这一景屡经查访未获结果。惟聊城谢玉林同志偶谈，乃指沙冈而言，他有何根据尚不可知。近闻河洼、土桥一带原为沙河，第五中学东北有地名曹家冈、郭家冈、薛家冈之说，此地多沙，平冈积雪指此与否？待查。

最后，就我自己目前所知，临清十六景仅能赘述至此，为收抛砖引玉之效，愿与大家商榷，并将历年考查之感受迺成小诗附录：

人间传闻若星河，	泾渭交流有清浊。
大海捞针凭慧眼，	沙里淘金费筛罗。
流光先摄终有益，	片石偶舍遗恨多。
纷纭百纳且条理，	定语还请智者说。



# 临清清真寺

潘耀曾

临清清真寺的兴建，与定居在这里的回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唐朝初年，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定居于我国的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地。久之，与当地通婚，繁衍生息。元朝以后，这部分人成为我国回族的一部分。同时随着运河的通航，水上运输贸易往来，宗教人士的活动，历次的反压迫斗争，回族人民的流动迁徙，随着沿运河两岸码头的设置，城镇的兴建，回族人民定居在运河口岸城市的人数，愈来愈众多。他们之中大部分为搬运工人、船夫，有的则经商和经营饮食业。因之，作为伊斯兰教活动的礼拜寺，随之筹建起来，临清清真寺，就是在这样历史条件下兴建的。

临清市区原有三座清真寺，现存两座。分别介绍如下：

老礼拜寺：此寺位于运河东岸下，故称顺河清真寺；因其建造年代最早，又称老礼拜寺。《临清县志》记载：“老礼拜寺，相传为明常遇春所建，有明朝邑人方元焕手书‘开天古教’木质匾额，其字体古秀可观。”按《临清县志》修于民国二十三年，统治者对少数民族、抑伊斯兰教的观点，自会反映在新修的县志中。对于回族清真寺，如不载，又不可，其古代建筑屹立古运河畔，为回族人民宗教圣地，是人人所景慕；载之，则又应树碑、查证、考察，又实心所不愿，故而冠以“相传”二字，聊以塞责罢了。今查《临清直

隶州志》，更不如县志尚有数行说明，州志上竟无片言只字，可见以往对此寺的无视。现据查阅有关资料，可证确系明朝常遇春所建。

常遇春（1330—1369）字伯仁，怀远（属安徽）人，回族。明初名将，勇力绝人，善射。元末追随朱元璋，冲锋陷阵，未尝败北，常遇春自言能将十万众，横行天下，军中又称“常十万”。

《明史》一百二十五卷中《徐达传》有如下记载：“捷闻，太祖幸汴梁，召达（徐达）诣行在所，置酒劳之，且谋北伐……达顿首受命、遂与副将军（常遇春）会师河阴，遣裨将分道循河北地，连下卫辉、彰德、广平，师次临清。使傅友德开陆路通步骑，顾时浚河通舟师，遂引西北。”

《临清县志·大事记》记载：“元朝至正二十八年戊申（1368年）秋七月，明大将军徐达、副将军常遇春，分道渡河，循河北地，师次临清。”

从此可知徐、常师次临清的具体年代。使傅、顾二人分别开“陆路”、“浚河”，以排除水、陆进军障碍，这决非指日可待的事，徐、常在临清驻扎为时不会很短。同时可知徐、常在临清召集诸将，商讨北伐元朝京都军事部署，方有给傅、顾的具体任务。因在临非暂短停留，后来才会有“帅府街”之名，其近处又有“更道街”之名，夜有更夫循帅府巡逻，故有此名。

常遇春为明名将，是回族中杰出人物，军中回族将校士卒亦非少数，又驻临较久，当时临清回族人士，伊斯兰教的阿訇，势必进谒常遇春，谈及筹建礼拜寺，所以才有了常遇春建造礼拜寺之举。



老礼拜寺，由隆起大殿、望月楼、寺门内阁楼、讲堂、浴室等组成。于1968年修浚卫运河时拆除无存。

北礼拜寺即清真北大寺，亦称洪家寺。位于城区西北部，先锋大桥东南，牌坊街东侧。原东门为正门，今已堵塞不通，在寺西门（后门）以北另辟一门。

此寺是一座保存至今较为完整的古代建筑群，始建年代已无可考了，据重修石刻碑文记载，此寺为“明嘉靖四十三年甲子（1564年）孟春重修”。在大殿抱厦南壁上嵌有一石刻碑文，系大清嘉庆十四年己巳（1809年）夏月谷旦立。从重修碑文可以证实北大寺始建时期当在明朝。碑文有如下记载：

“清源北礼拜寺，相传创自前明，重修亦在崇祯，时经今百有余年，虽栋宇之完好如故，而大殿上多半剥蚀矣。己巳夏，北顶为风雨摇落，桃角稳脊亦皆倾圮，其北坡尤甚。斯时不急为整理，功将益大。乃集同人，鸠工庀材，群情翕然乐成，是役六月中兴工，至九月而大功告竣。榑桷之亏损者，益之；檐椽之朽蠹者，更之；瓦甍之废坠者，修之。三顶重新，大脊坚整，诚足以增吾教之光辉，而见同人之协和也……”重修时首事监工人为洪大观、张德成等人。此寺即以嘉靖四十三年重修计，至今已有四百余年的历史了。

此寺在一九五八年为回民福利皮毛厂厂址，在一九八二年该厂迁出，由临清县清真寺管委会管理，一九八三年四月因寺大殿年久失修，桃顶及南顶坡毁损，开始重修。

这座清真寺，由隆起前殿、后殿、抱厦等组成勾连搭式建筑。殿顶复有绿色琉璃瓦，后殿又有塔楼高耸，殿脊有三，中间较高，均置桃形空心铜顶，飞檐四出，犹雄鹰振翼，雄

伟壮观。更为宝贵的是透雕挂落、雀替，保留着明代建筑的风格。在大殿左右又有角亭对立，在大殿正前方又有一座小巧玲珑、精致秀丽的望月楼。它是由两排左右对立、中高两低的木牌坊与歇山重檐楼阁合为一体，布局精巧，结构严谨，是极为少见的古代建筑。寺内尚存十余株古柏，使此寺显得古老、庄严、幽静。经今修葺，大殿雄姿复初，桃形铜顶高耸入云，金光闪烁，迎旭日朝辉，送晚霞余虹，仰对碧空星，静夜伴银月。游人漫步古运河岸，举首眺望，无不赞叹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现在修缮艺人技术高超精湛，给此名胜古迹增添无限光辉。

东礼拜寺：位于市区羊头锅街北头，原洪家水坑（今已填平）东沿上，此寺创建年代待考，其规模较北大寺为小。寺大殿后殿脊顶原有一个桃形铜顶，因毁于十年动乱期间，后换一方形木质顶。寺殿后墙岌岌可危。现为回民皮毛厂厂址。在东寺北讲堂房檐滴水处，有一残碑作台阶，碑上残留修资人姓名，姓氏不全，亦难全辨认，又有“清道光六年（1826年）”字样，修葺载于石碑，可见为工程较大的修缮。

现在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临清北大寺已拨款修缮，奈工程浩大，殊为艰难，目前正在继续修缮中，使这古代建筑群更好地存留下来，当为期不远了。

# 临清砖窑史话

张 伟

如果你去过北京十三陵，在定陵地下宫殿入口处的图表上就会发现：修建十三陵的砖，来自山东临清州。不仅如此，清代修建的东陵、西陵，明清两代修建的北京故宫各大殿，以及修筑紫禁城等建筑物的用砖，也有部份是临清烧制进贡的。

临清建皇窑烧砖进贡，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据《临清州志》记载，临清砖窑建于“明永乐初”，清代仍延续烧制，一直到清末才停烧。当时，朝廷“岁征城砖百万”，其烧制规模，可想而知。

临清砖窑在明代，“设工部营缮分司督之”。清代“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裁工部营缮分司，以山东巡抚领之，监办官为东昌府同知，承办官为临清州知州，分管官为临清州吏目、税课局大使、临清仓大使、夏津县巡检、清平县巡检”。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专归临清州管理”。

砖窑之所以建在临清，一是临清一带土质好，细腻而无杂质，俗称“莲花土”。据说用这种土烧制的砖，异常坚硬，敲起来有一种悦耳的铜音。二是，临清紧靠运河，交通方便，烧出的砖可直接装船运往京城。据《临清州志》记载，明初“临清砖就漕艘搭解，后遂沿及民船装运。今（乾隆五十年前

后)仍复漕船运解通州”。

根据志书记载和实地考察,明清两代的砖窑计有数百座,都分布在运河沿岸。从临清西南部约三十华里的东、西吊马桥,到东、西白塔窑,再至临清东北部的张家窑,一直伸延到临清东南部的河隈张庄,总计长约六、七十华里。其中有的地段砖窑分布特别稠密,例如从东、西吊马桥到东、西白塔窑十多里长的一段中,每隔几十步就有一座。

时至今日,如果你到运河沿岸旧窑址附近的村庄走一走,就会发现,在许多农民的房基上,仍砌着明清时代的老砖块。在这些砖块上,还打着不同的印记。诸如:《嘉靖十五年窑户罗凤、匠人郑存仁》、《万历四年窑户马元造》、《临清厂窑户孙岳造,作头于其》、《万历二十七年窑户梁应龙、匠人赵田造》、《崇祯四年窑户盛……》、《康熙十五年临清窑户畅道、作头郭守贵造》、《康熙二十八年临清砖窑户周循鲁、作头张名仕、张化豹造》、《雍正五年临清砖窑户刘承恩、作头王加禄》、《乾隆□年临清砖窑户畅道、作头盛帮现造》、《乾隆十二年临窑张有德、作头王禄造》、《道光□年临清砖窑、作头崔贵造》等等。

从上述印记中可以看出,明清两代的临清砖窑,有窑户、作头、匠人。据考察,窑户就是窑主,具有管理窑场、招雇工人的权力。作头就是窑场生产的直接参加者和组织者。匠人就是窑场中的技术工人。

除了上述三种人,根据实地了解和考察,当时在窑场中还有从事挖土、筛土、滤泥、踩泥、装窑、出窑、搬柴、担水等下手活的普通工人,而且为数不少。每座砖窑除窑户外,作头、匠人和普通工人,约计五十人。

作头、匠人和普通工人都是被雇佣者，他们的生活收入全部依赖窑户。窑户把砖直接卖给朝廷，朝廷则从国库中拨款付给窑户。

此外，在临清砖的印记上还有：明《成化十八年（公元1482年）成武县□造》、《弘治八年辉县造》、《嘉靖六年春，窑户郭绍为、保定……》、《嘉靖十年春、窑户刘经为河南府造》等。这证明，明代中期以前，明政府曾指派外县、外省的匠人，到临清砖窑服过徭役。据考证，明朝初年手工业工人都编有匠籍。这些在匠籍的手工业者，每年都要自筹路费、自备吃用，轮流到朝廷指定的地方服徭役。在服役期间，要受严格的管理和约束，私自逃亡者还要“夹项三月”。这样，在临清的砖块上也就出现了上述印记。明朝后期，由于改行以银代役的政策，手工业劳役制度基本废除，临清砖窑也由单纯的官办变为官督民办，所以此后也就不再有外省、外县印记的砖块了。

由于临清砖专为修筑皇宫殿陵所用，故对砖的质量要求很高。明清两代的临清砖窑都有一套严格的技术操作规程。烧砖用土，必须先用大、小筛子各筛一遍，再象过滤石灰一样滤一遍；滤满一池待其沉淀后，再从滤池中将泥取出；用脚反复踩匀，才能用来脱砖坯。

在所有的工序中，脱砖坯是最累的一道工序。具体操作程序是：先在砖模里铺一层湿布，再从踩好的泥堆中取出一块约七、八十斤重的泥团，经过一番加工，用力摔入砖模中，既要保证四角四棱填满填实，又要掌握泥块不多不少。多了，不好刮，一刮就留下痕迹；少了，不能添，一添就烧不成块。摔好以后，再连泥带模一起端起倒出，即成砖坯。砖

坯规格有三种：一种长一尺五寸，宽七寸五分，厚三寸六分；一种长一尺三寸，宽六寸五分，厚三寸三分；一种宽七寸二分。当时各窑场都设专人检查砖坯质量。要求棱角分明，光滑平正。凡质量不合格者，即踹烂返工，故一个工匠每天一般脱二、三百块，一个最熟练的工匠，顶多能脱四百块。

砖坯晾干后，便装窑烧制。砖窑有大有小，分别可容一千块、二千块、三千块、四千块。燃料为棉柴和豆秸，据说用棉柴、豆秸烧砖火候匀、质量好。烧砖必须由经验丰富的火把式掌握火候。每窑砖要烧制半个月，再封窑浇水润半个月，然后出窑。由于非雨季可积存砖坯，故能常年烧制。

烧好的砖呈豆青色，经严格检验后，每块再用黄裱纸封住，然后用小拱车推到专用码头，装船运走。到天津后再一一拆封，重新检验后再次用黄裱纸封住运往北京。凡声哑及不堪用者，俱存天津西沽场。

临清砖窑所用烧柴，由附近各县供应，并设专职官员办理。据《临清州志》记载，每烧砖一窑，约需柴八、九万斤，办柴州县除东昌府属外，有东平、东阿、阳谷、寿张共十八处，每年领价办柴送往各窑。

砖窑既然直接为朝廷服务，朝廷也赐给窑场场主某些特权，并给予优厚的待遇。窑场场主都有朝廷赐给的黄马褂，每座窑场门口都划有禁区，树立着朝廷赐给的虎头牌和黑红棍。这种棍子是木制的，半截黑、半截红；一把粗、一人高。凡有私闯砖窑或在窑场闹事者，用此棍打死勿论。至今在临清还流传着“打架上官窑”之说。意即闯了祸往砖窑一躲就可平安无事。据临清张家窑村几位老人讲，曾有一个馆陶人，在当地杀了人，逃到临清张家窑在窑主段乔岭面前下跪，

请求留在窑场避难。段乔岭问他留在窑场能干什么。他说，自己身强力壮，善于推土。结果留下来，干活很卖力气。后来馆陶县官闻知此人下落后，亲自坐轿来窑门口索拿逃犯。窑主段乔岭出面辩解道：“这个人在这里干活，已经三年没回家了，不会在你那里杀人。”县官无奈，只好作罢，此后，这个逃犯便逍遥法外了。

窑主享受的待遇主要有：

一、每座砖窑官府都划给土地四十亩，专供建窑、取土、堆柴、存坯之用，也可种植作物，收成归窑户，且不纳税。

二、窑户每烧制一块成品砖，朝廷付给工价钱二分七厘。至清代末期，改付工价钱两吊。这些钱大部被窑主吞占，分到工人手里的则为数不多。

三、明清政府曾用预付定银的方式扶植窑户。据张家窑村的老人们讲，有一次朝廷曾拨下定银四十八万两，付给了张家窑段家、迟家和河隈张庄程家等窑户。

尽管窑户享有上述特权和待遇，但在昔日的古窑址，今日的河隈张庄，却听到几位老人这样一段回忆：清朝末年，河隈张庄有位姓程的窑户，人称程十爷，（访问时在场的程家后代，村妇女主任说，她曾亲眼见过程十爷身穿御赐黄马褂的画像）当时，他掌管着若干窑场，并种着官窑的四、五顷地，家境很富有。但后来砖窑停办，而他生活开销又大，便逐渐把窑场的四、五顷地变卖了，因此闹了一场官司。最后官府判决：凡从程十爷手里买的地都不算数，必须向官府重新付钱才行，结果这些地又被陈官营的卢家买去了。后来这位破产的程十爷只好每天去砖窑拣破砖，靠卖破砖度日。

这说明,虽然窑户掌管着窑场和土地等生产资料,但只有使用权;并没有出卖权。

总之,临清砖窑的发展史是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课题,值得众多的有志者研究探讨。

时至今日,北京城内用临清砖修建的故宫殿陵,虽历经五百余年的风雨沧桑,但仍不蚀不碱,这不仅是我们五千年文明古国的骄傲,也是临清人民的光荣。



# 回忆我在教会学校的生活

李 启 才

我生在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里，父母都是虔诚热心的教徒。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当我呱呱堕地的第八天，就由亲属抱我到教堂里，受了洗礼，洗名“若瑟”，我就成了教徒。按教会内的话说，我是一个老教友。其所以要出生第八天就施以洗礼，一则因出于虔诚，相信会迅速摆脱原罪的枷锁；二则因是教会的习惯，因为耶稣是出生第八天上施以割损礼的。

我在婴儿时期，体质不太好，时常生病，为此，虔诚的父母把我许愿给天主，将来长大成人，送我进修道院当神父。在一九四一年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为了还愿，被送到临清小修道院（地址在今临清一中处），做了修道生。小道院的课程，除一般小学应读的课程外，再加读教会道理及拉丁文，因为将来做神父，必须读神哲学。神哲学课本都是拉丁文的，而且神行圣事，做弥撒都是拉丁文，所以拉丁文成了主课。高小期间必须读完字母表及初级课程。

一九四五年，我高小毕业，临清解放了。随之，小修道院便解散了。临清教区主教李萃臣就把我们送到了济南教区洪家楼小修道院。

在济南小修道院，人地两生，很不习惯，特别是院长及部分课任神父都是德国人，感到很别扭。他们那半中半洋的语

言，有时我就不了解他们说话的意思。那里有好些土规定，见了他们即使在院内、大街上也得脱帽鞠躬。我虽年仅十五岁，民族自尊心还是有的，不舒服的心情油然而生，我堂堂炎黄子孙为何给他们这些金发碧眼的洋鬼子鞠躬呢？但一转想，啊！他们是神父，是代天主权的，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

一九四八年济南解放前夕，我初中毕业，小修道院与教会学校黎明中学合并了，搬到经五路纬五路妙法里，仍由德国神父严和悌任院长。白天去上学，晚上回修道院加读教会道理及拉丁文。既是教会学校，教徒学生就多些，在全校一千六百多学生中，教徒有一百多名。为了给教徒立好表率，修道生就得以身作则，首先学习成绩要优秀，高中课程加上主课拉丁文，学习压力不小。我们几个学习好的同学基本上达到了要求。在初中毕业前已读完了拉丁文中级课程，高中就学最后的部分了。由于拉丁文学完了大部，为了到大修道院达到能听能说的要求，院长规定凡是去他屋办事和在饭厅就餐，一律不准说中国话，必须用拉丁文。经过如此锻炼，到高中毕业时，拉丁文基本能运用自如了。

一九五一年，我高中毕业，拉丁文考试及格，升入了北京文声学院（即大修道院，地址在阜城门外和西直门外中间，西郊公园正南一公里处），这里集结了东北、华北、西北各教区的大修道生。学院为六年制：哲学二年，神学四年。若被认为合格，就晋升为神父。这里是教会内的最高学府。

教会内晋升为神父的程序是这样的：先施以剪发礼，表示已看破红尘，与世绝缘了。然后逐级晋升，一品到四品为小品，尚能还俗结婚，然后是五品、六品为大品，再不能还

俗了，再晋升才是神父，主持这些晋升仪式的，必须是主教。

这里的一切规定要比小修道院严格多了。三面三层楼，一面二层楼组成一个严密大院，称“禁地”，严禁任何女性进入，即使母亲、姐妹来探望，也要在外院会客室谈话。记得有一次，一位派出所的女民警进了院子，我们都感到毛骨悚然，认为这是莫大的“逆行”。居住方面，要比一般大学阔绰多了。每人一个房间，但不得随意串屋聊天，若有事去找同学，需要先去住在该条楼道里的神父请假，还不得进屋，在门口小声说一下要谈的事情或借点什么东西，找到同学谈完话或借了东西，赶快即刻离去，若进入门内再关上门，让神父遇上，即被开除。为了有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一踏上楼梯，需绝对缄默，不准说笑，因为楼下是教室、圣堂、餐厅和游艺室及阅览室等。二楼、三楼全是住室。

我们刚入校时很不习惯，如规定早晨进堂望弥撒，一定穿大褂；一般进堂或餐厅，一律需要穿大褂或制服。我们这批中学生新来乍到，不注意就穿着衬衣出来了，为此，屡遭训斥，说我们没大修道生气魄，纯是学生派头。

这里所有的课本全是拉丁文的。哲学系：哲学、圣经、语文、教会法典、教会历史、教会礼节及哲学史；神学系：传道学、伦理学、语文、圣经、教会法典、教会历史及教会礼节。师资方面，除语文教师外，全是神父，其中绝大部分是博士或教授。授课用拉丁文。

一九五四年，文声学院解散了，当时我晋升为四品。

一直到了解放六年之后，通过学习及各方面的感召，我放弃了为之努力了十三年的教会生活，参加了革命工作，并结了婚。现在已有一子一女，都是高中毕业生，国家职工，

生活在温暖幸福之中。我参加工作后曾任总务会计、司务长、会计等，现在是农业局系统的待业青年商店负责人。

工作上，我并没有做出什么成绩，但党却给了我不少荣誉。青年时曾被选为县青联委员，省第四届青联委员，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县第五届政协委员。

我应当感谢共产党及一些老领导、老同志，给了我极大的关怀，我已五十开外的人了，我要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四化建设，贡献所有的一切，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前进！

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四日